

研讨实录

第 153 期

153

座谈会：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第 13 届研讨会
——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917号807室 Address: Rm 807, 917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三年六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的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俞' and '忠' (Yu Zhong)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 2023 年 5 月 27 日举办了“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第十三届研讨会——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该论坛是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与金融中心、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

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致辞并进行主旨演讲。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 3.0 版，要在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进行金融制度性开放：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新要素）、可持续金融领域（新领域）、金融市场配置国际资源（新功能）。

论坛的专题一为“金融制度性开放的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卜永祥指出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走过了 WTO，正在经历 RCEP，未来应该在 CPTPP 框架下实现高标准的对外开放。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顾问刘元春认为金融制度性开放需要进行基础理论和学理性的研究。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华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仍存在四个短板，需要在五个方面着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贸易发展新局面。

论坛的专题二为“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花旗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金融市场部中国区总经理杨骥，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成员张光平，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委员曹文炼，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委员张宇燕分别发表了演讲。

论坛的专题三为“吸引外资流向实体经济，建设“硅谷”型科技创新生态圈”。未尽研究创始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周健工，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邵春堡，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叶强，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贸易金融处处长孙筱和，对外经贸大学金融战略与量化中心主任曹诗男教授分别发表了演讲。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6 月 15 日合办了第 179 期上海发展沙龙，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和培训部部长邢予青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的演讲。他认为全球化并未停止，未来的全球化更强调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中国是过去 20 多年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最大获益国。中国为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风险，短期的策略是积极进行中美之间的谈判，并努力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长期的策略是打造更多的跨国公司，并实现从世界

工厂向世界市场的变化。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第 13 届研讨会 ——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幕式..... 1

屠光绍：致辞 & 主旨演讲 2

专题一：金融制度性开放的下一步..... 14

卜永祥：WTO、RCEP 和 CPTPP..... 14

刘元春：形成具有学理支持的引领性标准以主导未来发展..... 23

张国华：高水平开放引领贸易强国建设..... 26

提问 & 讨论 33

专题二：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39

杨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状况与推进途径..... 39

张光平：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和动力..... 46

刘晓春：冷静看待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51

曹文炼：金融对外开放的回顾及未来展望.....	56
张宇燕：国际分工、新能源、人民币化.....	64

专题三：外资流向实体经济，建设硅谷型科技创业 创新生态圈..... 67

陈东升：促转型、扬优势、增动力、补短板、强协 同.....	67
周健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影响.....	72
邵春堡：关于创业与投资的热土、魔鬼和秘诀.....	76
叶 强：建设科大硅谷，着力吸引外资和人才.....	80
黄 峰：发挥外资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84
孙筱和：临港新片区要成为拥有无限潜力的热土..	87
曹诗男：如何做才有利于科研创新？	91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 99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第 13 届研讨会
——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

2023 年 5 月 27 日

中国·上海

开幕式

王玉龙（主持人，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尊敬的屠市长、李若谷行长、曹文炼司长，在座各位嘉宾，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第十三届研讨会”。

“安全”这个词，在十九大报告里大概出现 21 次，这次的二十大报告里一下子飙到 93 次，唯独这个概念增加得太多太多。安全一旦跟经济挂钩，在我理解中，那就是一个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和美国划分了八个领域，彼此展开博弈和竞争，其中最接近就是经济指标。林毅夫先生比较乐观，认为 2030 年在经济指标上中国就可以超过美国。只有在经济指标超过它之后，我们才有更多的经费用于科研，甚至国防、教育等等，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关于经济的世界之问是：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会以较快的速度超过美国？这是经济安全的问题。其次是金融的问题。这次俄乌冲突，西方实施了 12 级制裁，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三，拜登政府对中国实行“小院高墙”战略。这些问题要逐一解答，答案就是高质量、高级别、制度性的高水平开放。开放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智慧，背后牵连着很强大的生态系统。波普尔强调开放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国家搞中国式现代

化、中国式全球化，走向未来、星辰大海而言，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顾问、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发表精彩演讲！掌声有请！

屠光绍：致辞 & 主旨演讲

屠光绍（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顾问、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各位新老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受论坛委托，主要是乔会长和玉荣秘书长的委托，代表他们针对第 13 次研讨会给大家致辞，特别是这次会议又在上海开。同时，我也就金融制度性开放谈一点想法。首先要对今天来参加闭门研讨会的各位新老朋友表示欢迎，也要向大家长期以来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表示感谢！

我们 30 人论坛建立以来，虽然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们研讨活动、交流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哪怕在疫情时期也是如此。我们 30 人论坛这个活动，规模并不大，就几十个人。但是大家知道浓缩的是精华。有的活动，规模比我们大得多，大也有大的好处，来的人多。但是，大的活动有时候流于形式，特别对于重要的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并不能够进行深入的研讨和激烈的交锋。我们闭门探讨，虽然规模不大，但有我们的特色，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行更深入、更坦率，能够更激烈地进行思想和观点上的碰撞。我们 30 人论坛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十三期了，在几个发起人的努力下，在各位的共同支持下，第十三期如期召开。这就说明我们是有生命力的，也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这种方式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同。所以我要向第十三次研讨会，特别是在上海召开，表示祝贺！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题目很大，大题目下面可以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又在上海开，大家知道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 3.0 版。从 1992 年开始到 2002 年，这是 1.0 版，国家把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战略提出来，我们取得了长足进展，基本搭起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框架。接下来，从 2009 年开始到 2020 年，把它叫 2.0 版，最重要标志是国务院 19 号文件，我到上海之后参与了这样一个工作进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从之前只是提出国家战略，到 2009 年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又提出了具体的阶段性的规划，这就是国务院 19 号文件，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从战略任务到战略实施以及战略推进的政策，都提出一系列措施和安排。它提出来到 2020 年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2020 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与国家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 2.0 版，有国家战略部署的推进，有各个方面的强筋健骨。在 2020 年结束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包括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家战略任务做了一个总结和回顾，提

出一个基本概念，即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要推进，我就认为现在进入了 3.0 版。3.0 版最重要的大背景，当然是我们国家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特别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提出高质量发展等等，对金融工作，也包括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所以，我认为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到 3.0 版。进入 3.0 版，无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身的任务，还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更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体现。开放是最重要的动力。我们叫“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这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谋而合。3.0 版就是要进一步开放，二十大报告里面专门提到要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这次二十大里专门提到要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关于金融，当然也需要制度性开放。而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讲，确实要从过去机构开放、市场开放，转到未来更多地把机构和制度性开放结合起来，同时要以制度性开放为引领，带动金融其他方面。

今天我利用致辞的机会，就谈谈下一步在金融制度性开放方面，有三个重要的领域。这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下一步需要加快推进的，要以新的高水平开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时对我们整个金融体系也有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新的领域。

第一，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必要性。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二十大已经把数据作为五大要素之一，对于我们整个金融体系，数据也是一个最基础的、越来越重要的要素，跟传统的金融要素相比它是一个新要素。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当然越来越需要数据的跨境流动，特别是开放。过去我们有很多开放，我们要素都在开放。

随着我们机构的开放，我们现在有很多母子公司结构，例如境外机构在中国设立它的子公司、分公司、分支机构。当然反过来，中国也有越来越多金融机构走出去，母公司在这一边，但是它在境外有分支机构。这种母子公司除了在业务方面以外，在它的统一管理、投研、风险管理等方面，都需要有数据流动。另外，作为一个跨国或跨境的金融集团，它内部资源的配置也需要数据来支撑。那么不可避免的，就要涉及到跨境监管。随着整个金融开放，引进来走出去，我们需要有跨境的监管合作。这个我们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对跨境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样也对数据的跨境流动提出了非常高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另一方面，跟其他要素相比，很多数据有敏感性，涉及到安全问题，又涉及到隐私问题，还有数据治理的问题。所以，金融数据怎么样能又流动，又有监管，又兼顾数据安全，是一个重要问题。

数据跨境制度是金融制度性开放的新领域。我前一段时间跟我们机构走出去，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在上海集聚，大家都提出这样一个诉求：我们数据怎么样跨境流动？它已经成为金融跨境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在制度建设方面，从全球来看，各个区域，包括一些国家，也在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比如说欧盟有一些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美国等国家也有。但是现在全球统一的跨境数据框架并没有形成，大家还是各自搞各自的。

回到跨境要素流动，当年的 WTO 就解决了很重要的要素流动问题。在货物贸易中，无论是贸易规则，还是打官司、仲裁，WTO 都有一整套的制度，所以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当然后面也有服务贸易的制度。可惜现在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使 WTO 有些功能面临停滞。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依然很难阻挡，只不过形态变了，从全球化统一规则体系慢慢变成一些区域化、群体化的体系。现在谈全球数字贸易，里面涉及到数据的跨境流动。全球金融资金流动、全球机构业务跨境，对于数字制度建设、跨境制度建设提出要求，但是这方面的全球治理框架还没有形成。当然，有很多具体的讨论，比如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自由流动，还有数据存储本地化的问题，这两大核心问题现在确实还没有全球的框架。

中国要更高水平开放，又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此时全球又面临随着数字经济和数据跨境流动的发展问题，其中金融机构的数据跨境流动又至关重要。针对这样的局面，中国现在也在制度建设上跨出重要的步伐，涉及到数据跨境流动的“三法一办法”，即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以及安全评估办法。这些应该说搭起了基本框架。但还是有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涉及到金融数据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现在的规定比较原则。比如说三法里面，重要的、有业务需要的可以跨境。但是什么叫“有业务需要”？还有谁来判定什么是重要数据？这些原则不具体就很难判定。到了具体业务方面，包括涉及到金融机构的数据流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很难落地。现在提到数据安全分级，但是金融领域数据分级怎么办？特别涉及到数据跨境，按照不同行业、不同金融监管来管理。金融管理部门在整个数据跨境流动的大的办法里，怎样更好衔接，这个部分亟需更好的安排。这些都涉及到下一步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都是需要进一步明确。

好在前不久，今年前几个月，人民银行已经开始试点。最近看到了在横琴的一揽子方案，涉及到澳门和广东，特别是珠海之间的合作，里面也提到数据跨境流动。还有前海，在香港和深圳经贸合作意见里也谈到了，在前海设立的香港金融机构和内地通过前海在香港设立的金融机构，互相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我认为通过试点的方式来发展，这是好趋势。

既然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制度是非常重要，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应该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上海历来在整个金融改革开放方面，是走在前沿的，而且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亟需在金融制度跨境流动方面先行先试。国家层面已经对临港做出了试点安排。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够，到目前为止，临港金融机构的集聚度不够，集聚量最大的还是浦东。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临港关于数据跨境流动发展的范围扩大到浦

东。几年前总书记给浦东定的是“先行区”，浦东也承载着整个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角色，特别是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所以，应该在上海扩大范围，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至关重要。按照国家立法层面的安排，在市人大的授权下，浦东可以立法。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对上海的重要性，还是对金融中心重要性而言，再加上有先行条件，有立法这方面的安排，在数据跨境制度建设方面，应该让上海有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先行先试。这是第一个观点，我认为制度性开放，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在上海有更大的意义。

第二，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可持续金融是这几年刚刚提出来新概念。围绕可持续金融，还有其他概念，比如说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又有纯绿色金融，还有转型金融，绿色低碳。又比如说 ESG（Environment 环境、Social 社会、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当然也应该纳入到可持续金融里面。ESG 的投资跟传统投资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环境、社会、治理纳入到投资体系里来，这就是一个新的金融投资的领域。还有比如说影响力投资，另外，普惠金融有相当一部分也可以放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可持续金融是全球趋势，就是围绕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上整个社会群体的分裂，甚至是撕裂的状况，提出了社会责任，再就是整个公司治理。ESG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有三方面的内容，但是它是统的，E 是环境、生态，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指标，具体的内容；S 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利益相关者；G 是公司治理，但是不同

于传统的公司治理，要在考虑环境和社会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怎么有效。所以 ESG 是一个整体。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如果社会责任没有尽到，社会利益相关者没有考虑到，公司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近年来，可持续金融在全球具有非常蓬勃的发展趋势，不光在发达国家，即使是东南亚对于可持续金融也越来越关注。我在印尼呆了好几年，印尼也是积极参与的，印尼人口马上接近 3 亿，年轻化程度很高。东南亚这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重视可持续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可持续金融在制度建设方面，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致力于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基础制度，这里面涉及到规则和标准，是一个新领域。

中国加入 WTO，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已有一些体系和规则，我们是后来者，是适应者，是学习者，是参与者，是跟随者。别人原来那些规则已经制定好了，我们就要拥抱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这样既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要贡献，也壮大了我们自己。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金融是全新的领域，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规则、标准的制定。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金融领域，这样一套规则标准是全球竞争合作的制高点。这一新的制高点不同于传统的规则，因为现在还没有全球统一的规则。所以我认为，在可持续金融制度建设上，中国应该更多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多在国际上增加我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跟国际趋势更好地融合，在某些方

面起到引领作用。比如绿色金融是可持续金融里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和欧盟一起推出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中国贡献了不少智慧和成果，十几项分类标准里由中国提出的标准采纳了 5 项，这就是参与国际制度制定，引领国际的制度制定，贡献中国的力量，贡献中国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这是一个新领域，全球也亟需形成更好的统一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现在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不是一个政府组织，市场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靠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制定规则 and 标准。中国早就加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国也更多采取会计准则带动中国跟全球经济的融合。因为会计制度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制度，现在又有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专门在可持续领域制定规则。当然，相对于会计准则理事会而言，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的制定更复杂。原来会计准则主要是财务准则，相对比较客观，比较可计算、可度量。可持续准则，像环境、生态方面，大家会形成一些统一的共识。但在社会责任方面，包括治理体系方面，面对的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体制机制也不一样，这需要在全球共同交流和相互影响中，逐步推动全球统一的基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显示中国自身的特色。在从 ISSB 推出全球可持续准则方面，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对于可持续金融，中国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转化成我们在全球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是需要

做出努力的。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可持续金融领域上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先行先试方面，在国际交流方面，在国际引领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对于可持续金融领域，上海已经提出了规划，比如说绿色金融中心，这是环境建设方面的。在 ESG 方面，上海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发挥作用并不只是上海的事，上海应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准则参与以及互动方面。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金融市场配置国际资源方面要有更多更大力度的开放。这当然包括金融市场配置国际资源的制度性开放等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机构开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向上海集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健全，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行间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外资比例虽然还偏低，但是都在不断上涨。我认为和过去的开放相比，现在要以配置国际资金和资本为主，将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要成为国际资产的配置中心。

资产和资金资本是不一样的，资金资本是拿钱过来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债券，当然包括国债及其他一些中国的资产。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没有配置国际资产。几年前总书记提出这也是任务。大家都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国际资产交易平台。什么是国际资产交易平台？这意味着不光是自己的资产放到平台上交易，也要有更多国际资产到上海来交易，这才叫国际资产交易平台。

比如说外国公司能不能到你这里上市，这就是国际资产，不是你的资产面向国际化，而是更多国际资产到你这来交易。国际资产交易平台怎么建设？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就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版。本人叫了 20 多年，但是一直难以实施，当然有各种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的缺失就是我们没有配置国际资产，国际资产没有到上海来进行交易。这个交易一定会极大促进人民币的功能，因为国际资产到上海来交易，就是用人民币来定价。

国际资产交易平台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家可以做很多的设想。我认为最简单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境外公司到这来上市。20 多年前我当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时，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到证监会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再到上海市来工作也推进过这个问题，临门一脚就差一点。

我认为中国要更大力度开放，更高水平开放，金融也要更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3.0 版要国际化，开放是它最大的动力，应该补上配置国际资产短板，这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因为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来自境外。纽约易所的上市公司来自于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美国无论是纽约交易所还是纳斯达克，很多都是境外的公司。我们看香港，有很多境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却没有一家是境外上市公司，配置国际资产的功能从何说起？所以我认为，这个方面就是新功能。

金融数据是新要素，可持续金融是新领域，这个新功能

就是配置国际资源的功能，人民币对国际资产进行定价的功能。国际版如果在过去还不太成熟，现在应该成熟了。过去不成熟，体量不大，但现在我们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还不大吗？现在监管越来越成熟，二十大以后，我们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力在提升。过去我们都是散户，现在机构投资人在不断发展，我们都有数据，有指标。所以我认为，现在要抓紧时间考虑在金融市场配置国际资产的问题，这个开放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开放，是吸引境外公司、境外资产到你这里来，在你这里进行定价。这种制度建设是市场开放和制度开放的一个结合，更重要的是你的制度在全球有没有引领性，有没有吸引力。所以我认为，制度建设、制度开放在这个领域非常重要，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功能。

结合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关于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在金融领域，特别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我谈了三个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祝我们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王玉荣：谢谢屠市长的精彩致辞加演讲，他对我们新生机构一如既往地支持，非常感谢。上海建立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从战略上要有前置，深度思考 2035—2050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包括制度性开放、前瞻性的架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对方方方面面的影响，战略一定要充满洞见。

现在我们一起合影。

专题一：金融制度性开放的下一步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执行理事）：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早上好！刚才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在茶歇的时候，我跟参会者聊了聊，大家都觉得主旨演讲嘉宾讲的内容很精彩。屠市长从三个方面来讲，新的要素、新的领域跟、新的功能。很多人觉得有启发。我们延续好的基础，下面展开第一个专题的讨论，主要是讨论金融制度性开放的下一步。我们金融对外开放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下一步怎么进一步开放，增强国内金融的治理能力，如何推动实体经济向前发展？第一位发言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卜永祥。

卜永祥：WTO、RCEP 和 CPTPP

卜永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尊敬的乔秘书长，尊敬的各位老领导、老专家，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代表人民银行研究所周诚君所长来参加本次研讨会，本来应该是他来参加的，由于他忙于组织研究所理论学习活动，临时改派我来出席本次研讨会。

首先说明一点，我事先跟周所长关于发言内容没有做任何沟通，今天讲的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跟周所长、跟我所在的单位也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

本次话题非常好，是研究国家金融业对外制度性开放的问题。事实上乔秘书长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成果斐然，我今天一来签到，就给我们一本专著《国际金融规则》。

在当前研究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在上海。大家都很清楚，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除了二十大文件的要求以外，今年还是非常特殊的一年，2013 年 9 月 29 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今年正好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10 周年。总书记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特别强调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从上海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提升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开发，尤其是金融业开放，提升我们的开放战略，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话题非常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刚才屠市长已经涉及到，今天报告主要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在贸易、投资环节的基本制度框架，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WTO，第二个关键词：RCEP，第三个关键词：CPTPP。

2001 年到现在已经 20 几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在贸易、投资、金融业的开发开放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入 WTO 对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022 年 1 月 1 号，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生效, 中国对外贸易、投资、服务业开放是在地区性投资贸易协定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的, RCEP 是一个进行中的事件。

下一阶段就是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不管是把 RCEP 升级到 CPTPP, 还是我们加入到 CPTPP, 都是未来可期的事情。我围绕这样一个主线, 主要讲几点: 首先, 对这三个环节的金融业开放作一些分析和展望。然后, 对今天讨论的主题金融机构治理能力提升再稍微作一点展开。

中国加入 WTO 以后, 在制度性开放之前, 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主要是降关税, 在 WTO 框架下, 中国金融业对于加入 WTO 的各种承诺到目前为止已经超额兑现。加入 WTO 的时候, 政府管理部门当时有如临大敌的感觉, 感觉加入 WTO 对我们金融业会有很大冲击。现在看来, 中国加入 WTO 当时是惊险一跃, 恰恰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绝好的机会。

中国加入 WTO, 银行业当时承诺外资银行对中国客户提供外汇服务, 5 年以后本币服务, 保险务一开始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 50%, 两年以后允许设立独资非寿险的保险公司, 券商也是三年后外资比例可以达到 33%。

从 2001 年开始, 中国金融业逐步深化、开放。有一些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开放措施, 比方说 2002 年 12 月推出 QFII, 2005 年 7 月人民币进行了汇改, 2006 年我们推出 QDII。2014 年沪港通和 2016 年深港通。2019 年, 我们取

消 QFII 和 RQFII 的额度限制。在机构方面，2012 年取消了券商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期货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2018 年，我们国家取消了对银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最早对外资在银行业持股比例有一个单一股东不能超过 20%、所有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不能超过 25% 这样一个规定，在 2018 年就取消掉了。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非常成功的，超额兑现了加入 WTO 的承诺。

现在进行时中的 RCEP，是以东盟国家为主体，中国参与的一个大的全方位的地区贸易投资服务、投资协定。它对于银行业、金融业来说，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限制。在 RCEP 框架下，目前 RCEP 明确外汇和本币业务不受地域限制，但是在客户方面可以对本币业务提出一些审慎的要求，比方说对人民币业务能贷给哪些客户可以设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对于外汇业务没有客户限制。在营业许可方面，目前对银行业经营还需要一个批准的环节。RCEP 框架下，认为对银行业的许可也是审慎性的，但是可以保留的。营业许可方面其他的限制，包括对独资银行资质的要求都已经取消了。在 RCEP 正在进行的框架，对于银行业依然有牌照批准的审慎要求。

我们再看未来可期的 CPTPP，大家知道 RCEP 是提升亚太地区制度性开放水平的，但是与 CPTPP 相比，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金融科技、数字贸易领域，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目前 RCEP 的框架，我们应该通过主动申请加入 CPTPP，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今年政府

报告里面，总理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 CPTPP 高标准经贸协议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加入 CPTPP 是倒逼型促进中国体制改革的行为。总书记也讲过，开放就是改革。通过开放促改革，一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成功经验。一旦承诺加入 CPTPP，就没有退路了，后面再说承受不了要退出，这是不可以的。

用一个形象的话说，CPTPP 是一个 99% 的三零协定，99% 零关税、99% 零补贴、99% 零壁垒。在数据跨境流动，在国有企业，CPTPP 标准是高于中国标准的。尤其是提出国民待遇，你对本国居民和对国外居民待遇必须是一样的，你对一个签署国提出这样一个待遇，你对其他签署国必须实行相同的待遇。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不能设限的。而且对于国有企业和指令垄断的条款，包括取消对国有企业税收的优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优先交易，以及各种非商业支持等等。CPTPP 特别要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特惠融资措施，还要取消对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对目前中国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在融资方面、竞争方面享有优势，包括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享有非经济的、来自体制的优势。这种优势在 CPTPP 是很难继续维持的。

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条件下，我们国家虽然已经取消了外资券商、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股权比例限制，已经取消准入限制，但是仍然存在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受到限制，可以做这些业务，也可以领牌照，但可能批复时间

很长。我们的资本账户开放不足，对资金的跨境支付和流动存在限制，我们对资本账户依旧实行管制，这些都是跟 CPTPP 的要求不符合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范围还比较局限于基础业务，而且外资保险、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从申请到批复的时间都比较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存在“玻璃门”的约束。在 CPTPP 框架下，很难继续实行这样的政策。

所以，从刚才三条主线来看，我们走过了 WTO，正在经历 RCEP，但是在 RCEP 框架下，我们依然有业务限制，依然有审批许可环节，牌照管理，依然有资本账户管制。但是，未来应该在 CPTPP 框架下，逐步取消这些限制，实现 CPTPP 高标准的对外开放，这个框架下是 99% 的零补贴、零关税、零贸易壁垒。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三个里程碑协议和三个里程碑的方向。

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整体意义里，国家在开放中如何增强我们金融机构的治理能力。提高金融机构的治理能力，还是要落实好国际金融和监管规则，比如 2010 年 9 月制定的《巴塞尔协议 III》。我们通过落实《巴塞尔协议 III》，增强我们国家金融机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主要是在 5 个方面加强对咱们国家金融机构治理能力。

第一，按照《巴塞尔协议 III》，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第二，严格资本扣除限制。

第三，扩大风险资产覆盖范围，把更多资产纳入风险

资产。

第四，引入杠杆率的监管。

第五，加强流动性管理。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委员会对银行业监管引入一些新的监管指标，在流动性监管指标方面也引入新的指标，纳入监管。更多应用《巴塞尔协议 III》来治理我们的金融机构，对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尤其国际竞争力是大有好处的。

另外，我们提出制度性开放，包括在管理方面的开放。这方面重在营造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要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原则，来提升我们营商环境。

第一，要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西方的普通法系是禁止性列举的制度，这是负面清单管理很重要的思考。从立法角度上讲，两类政府立法的法律逻辑、思维方法有根本性不同。英美法系是禁止某些活动，禁止完这些绝对不可以的活动之后，其他活动都是可以的，这是西方普通法系立法的一个基本逻辑。而我们大陆法系立法的原则是，你只可以干这些事，其他不可以干。你有营业执照，是一家授权的银行，就可以开展以下业务，银行存款、贷款什么的，都是正面列举可以干的制度。这实际上只是在一系列庞大的项目中，给出少量的可以干的事。从立法角度上讲，是限制性、约束性的立法。当然我不是学法律的，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二，要强调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这主要靠两个

方面：第一是靠立法，法制先行，法制是制度的制，不是治理的治。这也是国际化通行的标准。第二是特别强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家是在一个相同的市场条件下，执行同一套法则，实行平等公平的竞争。就像奥运会项目一样，首先有一套明文规定，而这套规定对所有竞争者都是一样的，事先公布，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并且有公正的裁判，你有没有抢跑，到达有没有犯规，最后形成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规则。大家打造营商环境的时候，应该考虑要通过立法，通过平等竞争创造这样一个市场环境。

最后说一下标准方面。我们金融业对外开放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实现标准的开放。这方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们要以 WTO 协定中涉及的标准协定为基础，落实国际通行的行业标准。当然在这里面，也有可能实现一些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标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中国标准向国际标准的趋同，刚才提到中国会计标准向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绿色金融是新兴行业，这时候就要看谁的标准更贴近实际需要，更让大家接受。比方说绿债标准，我们国家在 2022 年推出中国绿债原则。在绿色债券标准体系方面，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推出绿债标准，气候债券组织也发布了气候债券标准（CBI）。基于这些标准体系，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绿债原则，我们先有绿色项目的名单，哪些是绿色的项目，这相当于定义什么是绿色行业和绿色项目。基于这样一个绿色项目的名单，中国就推出自己的绿债原则，主要也是围绕行业展开的，哪些行业发行债券可以定义为

绿色债券。刚才提到的 ICMA 标准和 CBI 标准有很大区别，西方标准更严格一些。我们国内有很多清洁能源，比如说煤炭清洁化利用，我们倾向于煤炭清洁化利用是绿色的，但是在西方标准里不认为这些是绿色。所以绿色金融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跟欧洲去谈，最后谈下来的 CGT（Common Ground Taxonomy，共同绿色分类目录）实际上就是把欧盟的标准和中国绿债的标准相互磨合，2022 年又有了升级版本的 CGT。这样就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形成了一致标准。有一些中国企业，已经用 CGT 标准来发绿色债了。

一方面，我们要接受人家的标准，比如说银行业监管规则的标准。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恢复和重整计划，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额外资本金的要求等，国际监管委员会都有一些要求。我们中国应该落实这样的标准，尽量跟他们的标准相协调、相统一。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将国内标准推向国际，使中国行业标准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纳为国际标准。

中国金融业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中国金融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通过开放促改革，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走过 20 多年，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未来应该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金融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经营范围、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向更高标准看齐，使得我们金融制度、金融开放水平与我们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

匹配。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落实好国际标准，同时让中国参与制定一些中国具有优势的行业的标准，比方说电子支付、数字货币，能够创出中国标准，并且说服其他经济体接受，或者跟中国标准融合。

我就跟大家报告这么多，请大家批评指正。

乔依德：非常感谢卜所长精彩的主题演讲，他回顾了我国加入 WTO，在金融领域做了哪些开放，这些开放又推动了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并且对今后金融怎么发展、怎么开放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跟思考，非常感谢！

下面的发言者是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顾问刘元春先生。

刘元春：形成具有学理支持的引领性标准以主导未来发展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顾问）：谢谢秘书长，也谢谢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的邀请。今天这个题目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二十大把更高水平的开放提出来，而其中很重要的内涵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国内超大经济规模来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二是要进入到制度开放新阶段。

目前对于制度性开放的重要性，大家形成了共识。但是有效路径是什么？我们制度性开放到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实际上大家的想法和观念的差异非常之大，特别在不同

行业里面。

我想谈几点自己粗浅的认识。

第一，在新格局条件下，我们依然需要以外促内，在制度上通过传统的开放、改革这样的传输链，对下一轮改革提供有力的动能和有效的方法。虽然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特色，但是事实上，世界标准依然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间需要强化的。我们目前的很多改革，进入到一个相对停滞或空转的状态，如何破局？我们需要有参照性，需要有新的动能。比如说，即使在产品贸易体系下，我们如何在一些新的标准、新的规则上与国际同步拉平，如何通过加入国际新体系来促进我们内部分割型市场的标准、质量一体化，还需要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动力。

第二，我们要铸就新的竞争力、新的竞争品牌，要求我们对不同行业进行分类处理，进一步对国际标准、准则、制度体系产生影响，甚至能够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引领世界标准。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聚焦目前在世界上具有弯道超车效应的领域。目前大家聚焦于一些新领域，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金融。在上两周，ACCA 行政总裁白荣女士专门到访上海财大，同时英国金融局主席、迪拜前金融局主席和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到财大来，大家对于国内外有关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标准进行了讨论。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绿色金融，涉及到公司治理体系，也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社会责任、劳工问题等。如何抢先

制定这样一些新领域的标准，成为国际势力角逐很重要的部分。在主板上市的四千多家公司在出具 ESG 报告，其他板的上市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基金公司和新兴金融公司都在琢磨 ESG。

我们的探讨研究很繁荣，但标准规则却很混乱。这种混乱状况导致我们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国体系、中国标准，中国理论。那么才能如何形成？这是一个关键。不是简单在运行上进行大规模实践就能解决的，当然实践是我们形成标准的重要前提。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基础理论研究，例如一些定性的指标如何有效转换成定量的指标。在这样的论证过程中，就需要政产学研一体化的支撑，从学界到金融界、政府界、监管层面进行共同努力，对于一些标准形成行业的倡导，上升为国家与区域间谈判的重要砝码。目前我们在很多谈判中，对于一些政策诉求很难提供具有学理化的基础支撑。因此，在我们加入到一些国际体系，想要影响一些国际准则、影响国际治理结构的时候，我们在话语体系上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的主张，以及相关的基础的研究。

我们下一步对于制度性开放，对于金融开放，不仅要关注所谓资本项下最后几项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在新领域上要有更深、更广的实践，和基于实践形成的中国数据、中国理论和中国标准。这样，我们在制度性开放上就不会出现自我混乱的现象。同时，在国际谈判过程中才会具备有利的砝码，而不是各自为政。我们一方面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国际体系，通过内贸一体化，同治同标一系列举措，促进我们内

部改革。另一方面，在具有引领性的一些领域，一定要产生具有引领性的理论和学理的支撑，形成具有学理支持的引领性标准，主导未来的发展。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刘校长。财大最近在临港新片区成立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他也兼任院长。他有几条发言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强调现在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以外促内，以开放促改革，这在过去 40 多年改革开放中是常见的一种措施。另外，他针对我们现有的一些问题，讲到如何开放，他强调以学理性作为基础来参与国际标准，甚至我们可以制定在某些领先领域的中国标准。这个可能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

前面两位都根据题目，讲了金融开放方面。刚才卜所长讲提到，金融开放跟中国加入 WTO 有密切关系，WTO 主要是贸易方面的组织，而金融跟贸易是密切相关的。下面我们听听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张国华副主任，他讲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进展和问题。大家以热烈掌声表示欢迎！

张国华：高水平开放引领贸易强国建设

张国华（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副主任）：非常感谢乔老师，我是来搬板砖的。我今天是从贸易这个角度来讲一讲我们资金流、贸易带来金融业务的需求，金融促进贸易的流通，贸易和金融是相互关联的。受新科技革命、国际形势变化、疫情冲击等影响，当前国际经贸金融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要坚持高水平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刚才讲到中国什么时候经济总量能够超过美国。但是我感到，中国有一个肯定是超过美国的，就是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整个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质量还不够高，可持续性还不够强。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6 年处于全球货物贸易首位。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第一贸易大国的位置还不是很稳固。

排名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21年		2022年	
	国别	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国别	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国别	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国别	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国别	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1	中国	3.95	美国	3.70	中国	4.10	中国	6.051	中国	6.31
2	美国	3.81	中国	3.68	美国	3.95	美国	4.692	美国	5.363
3	德国	2.37	德国	2.39	德国	2.61	德国	3.051	德国	3.228
4	日本	1.27	日本	1.25	日本	1.37	荷兰	1.593	荷兰	1.865
5	英国	1.08	法国	1.07	荷兰	1.22	日本	1.525	日本	1.654

图 1：全球主要国家贸易总额排名表 (WTO 统计)

根据 WTO 的统计，从 2013 年到 2015 年，连续 3 年中国都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 年特朗普上台，美国超过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2017 年到 2022 年，中国重新夺回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位置。但是，中国对外贸易还存在增加值不高，进口相对不足，市场多元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的问题。值得我们金融研究人员深入思考的是，怎么通过金融业务，怎么通过金融创新，弥补我们对外贸易四方面的短板。

第一个短板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大，进口规模相对

小，面临贸易摩擦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的进口一直以来都是老二，导致我们面临的贸易摩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 1990 年到 2022 年，我们只有 1993 年货物贸易出现了逆差，其余 30 多年都是货物贸易出口大于进口。2022 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 877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0.9%。2022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是 14.4%，进口占全球贸易进口总额比重是 10.6%，出口比进口要多 3.8 个百分点。我们顺差多，引发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已经连续 20 多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第二，贸易仍然比较大的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面临市场不确定风险在增加。中央一直强调出口市场多元化，我们金融应该在服务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做更大努力。从特朗普一直到拜登，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战还在持续，但是我们国家对美国出口 5818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为 16.2%，1/6 左右，我们对美国顺差 4041 亿美元，占我国总的货物贸易顺差的 46%，接近一半了。我们国家对欧美三大经济体的出口，从 2015 年到现在基本上保持在 40% 左右。我们的进口很依赖三大发达经济体，我们进口没有出口依存度高，但是进口的产品很集中，原油、大豆、铁矿石、飞机，我们对集成电路进口的依赖度很高，是第一大进口品类。

第三，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相对较大，但服务贸易占比相对较小。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 5.42 万亿元，增长 2.8%，但是比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低 0.6 个百分点。整个服务贸易占全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2018 到 2019

年，基本上保持 14.6% 左右的水平；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平均是 24%，我们相差 10 个百分点左右。我们服务贸易与美国相差非常大，2022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是 8790 亿美元，但是美国是 15493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57.4%，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 70% 以上的比重。

第四，我国货物贸易存在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存在较大逆差。我们服务贸易从 2009 年开始持续逆差。2017 到 2019 年，我们服务贸易顺差分别是 2395 亿美元、2582 亿美元、2178 亿美元。疫情以前大幅度减少，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出去交流也少。这几年服务贸易仍然是逆差的，但是美国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2021 年美国的顺差超过 2300 亿美元，欧盟服务贸易的顺差超过 1300 亿美元。

因为这四方面短板，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所以我觉得要按照今天讨论会的主题，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开拓贸易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何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防范风险，提高质量，这是要持续研究的课题。我们的商品流、资金流、物流、人流、数据流，整个规模都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有一些商品和服务对国际市场开的门比较小，有的是“弹簧门”，有的是“孤立门”，主要是我们国家经贸治理水平不够高，有些部门不愿意开。今年是自贸试验区 10 周年，看看今年浦东能不能取得更大的对外开放。坦率地讲，有的部门是不愿开，也有是不敢开。因为一开它就管不了了。

但是总书记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一定要以高水平的治理、高水平的开放促进高质量双循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上新水平，也推动我们金融业的发展上一个新水平，从而引领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我感到，有这样几个方面是要做的。

第一，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创新和市场推广，加快推动我国从贸易量大国迈向价值链强国。今后外贸竞争的重点是依靠科技创新，支撑价值链的提升，提高外贸增加值。我们外贸以后在全球的规模，如果是负增长，也不要紧，现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是 14.4%，我觉得比较高了，可以再下降一点。但是我们要推动外贸行业产生的增加值，提升对国内生产的贡献，提升在全球贸易增加值中的份额，要积极吸引国际人才，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要集中力量攻克外贸行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加强主体培育，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树品牌、优品质、提品类，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化知名品牌、优质服务对出口的引领作用。我们要研究金融业怎么强化对先进技术、知名品牌和优质服务出口的引领作用，怎么推动外贸企业，不把鸡蛋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个市场的篮子里，金融业怎么帮助外贸企业加大美国等以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尤其是要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要加强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的联动，鼓励各省市企业抱团进入一带一路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到新兴国家参加重大展会，增加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机会。还

要大力培育小语种人才，为什么我们习惯开拓欧美日市场？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外语人才比较丰富，但是对那些小国家，我们缺少这方面人才，更缺少相应的金融人才支撑。所以，我们要加强投资贸易风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建设丝路电商，拓展模式。

第二，坚定不移扩大进口，加快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循环相互促进。我们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要坚持进出口并重，早日成为第一进口大国。中国市场足够大，但不够强，所以要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平台的重要作用，积极扩大进口。但是，进口消费品的税费负担比较重，流通环境不畅，国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普遍比较高，老百姓部分需求在国内得不到很好满足，很多人跑到国外去消费了，购买品种也从高档奢侈品向日用消费品延伸。2017 年我们国家游客在境外消费的支出达到 2580 亿美元，这相当于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一年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还多。所以我们要抓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机遇，要打造“买全球”的市场，从“卖全球”向“买全球，卖全球”并重转变。我们要研究怎么样通过金融支持，来培育有眼光的买手。在开放方面，要减低关税，促使世界上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达到国际大都市水平，促使旅游者更多增加在我国的消费，也可以更好满足高端消费的需求。

第三，坚定不移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要持续拓展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 10 周年之际，争取服务业在持股比

例、行业准入等方面的开放有新突破。要在扩大开放中，增强我们国家服务业的竞争水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要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定，显著提高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外汇管理、资源流动等方面的管理水平，促进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和研发外包，这些都和国际金融紧密关联。

第四，坚定不移扩大数字贸易开放，加快贸易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经济全球化已经步入了数字贸易全球化新时代，数据流动赋予全球化比商品、资金、人员三大要素流动更强的新动能。刚才几位专家对金融数据有序流动，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要在保障安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全球化的布局，促进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为应对数字贸易市场开放的压力和有效挖掘数字贸易市场潜力，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尽快开展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网信部门、海关、发改、商务、金融等部门要加强协调，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在开放当中融入数字贸易全球化。最近有两个很好的信号，一是中国提出对全球数字治理有关问题的立场，二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和成员国部长见了面，开了会，反映我国进一步扩大数字贸易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更多从整个数据流动市场的全局、开放的具体环境，以及到底有哪些风险点，进行相应的研究，提出可测量、可操作的突破性措施，供中央有关部门操作，推动数据管理有新的突破。

第五，坚定不移扩大国内市场治理与国际市场对标，加

快打造强大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为整个中国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国内市场大而不全，市场治理水平还不高。刚才讲内需跑到国外去了，我们还是要在国内市场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来建设，真正打造讲诚信、守信誉的市场，一定要下大力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激活企业内在创新动力。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推动产品服务同线同标同质，打造标准对接全球最高水平、一体化的内需市场。要完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标准，支持制定服务国际惯例，让国内市场标准与国际最高标准无缝对接。

这五个方面，应该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拓展的重要方向。让我们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在大变局下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演讲，大家知道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把我国对外贸易的特点、长处，以及短板做了条理清楚的阐述，并且提出了 5 个方面如何去补短板，对我们充分了解我们国家对外贸易的状况很有帮助。

提问 & 讨论

乔依德：下面还有几分钟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对刚才主题演讲的嘉宾提问。

赵广彬（普华永道中国资深经济学家）：先问一下卜所长，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路还有多远要走，或者说我们能期望取得多大进展？中国资本流动什么时候可以期待？

还有对张先生的问题。数据的全球流通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上国外网站都是要翻墙，在上海是否可以试点一下？互联网没有限制流通，这样我们数据流通才能往前迈一大步。

卜永祥：提了非常好的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考察上海时说，要把上海建成人民币交易中心，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寄予了厚望。他的基本想法跟您刚才提的问题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资本账户还是有很大管制措施的话，资金不能实现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刚才领导讲的，上海证交所的国外投资者买上海发行的股票，那是不是担心什么时候可以把资金拿出境外？如果有这样的担心，谁还会再来这投呢？你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张国华：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非常关注的问题。刚才我也讲得非常清楚，数据流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定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我们国家态度越来越鲜明，我们给联合国也提了，中央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加入 CPTPP，也要加入 DEPA（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我们数据有序跨境流动还是指日可待的。尤其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临港新片区这些领域，尤其是商务数据这部分，它的自由化、便利化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开放可能性。

王玉荣：卜所长好。顶层设计，战略前置是很重要的。我们央行对早日建成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没有路线图？比如说 2035、2050 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

张主任，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是贸易，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跟美国之间贸易额能够提高？这样压舱石才稳固一点。另外，我们跟美国交往过程中，除了官方的交往，有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让其他的渠道流通起来？

卜永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和目标，什么时候建成，我不觉得上面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路径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跟香港相比，不是高楼大厦不如人家，是在一些制度方面我们差了太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资本账户管制，我们的立法体系是大陆法系，人家是普遍法系，至于人员讲不讲英语这不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什么时候能建成？我觉得已经建成了，它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但和纽约、香港和伦敦是不是一样，功能是不是那么完备，这个再说。我们资本账户管制开放，以及汇率管制，都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安全”这个词在二十大报告里用了 91 次，在渐进可控的安全宏观之下，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应该會实现。

张国华：首先，美国和中国经贸往来的排名朝后挪是综合来讲的，排在前面可能是东盟或欧洲，美国变成第三了。但从单个国家来说，美国仍然是中国第一出口大国，每年 5 千多亿美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虽然贸易战打了好几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有所减少，但是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还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的。

第二，中国，包括上海，高度重视对美经贸关系往来。同时美国也高度重视全球第一大潜在市场中国。美国企业是用脚投票的，跨国公司 CEO 纷纷到上海来，要见上海的书记、市长。前面几大汽车公司的大佬，包括一些电子公司的大佬，我们市商务委外事都安排不过来，有时候商务委领导也去见见这些 CEO。美国企业家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尽管美国政府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毕竟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现在美国政治家包括学者也在改变口吻。我们要加强与美国学者的交流，加强与美国协会的交流，加强与美国大学的交流，要降低少数美国人对我们经贸、方面的敌意，使得我们经贸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第三，中美是全球前二大经济体，是第一、第二贸易大国，这种位置短期内不会变化。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短期内也不会改变，而且还会保持增长。

郑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美国企业还是看好中国市场的，上海美国商会有 3000 多家会员，其中一千多家是比较主要的企业，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战略市场。虽然过去几年大环境有很多挑战，尤其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地缘政治的原因。但是企业还是看好市场，现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企业，在民间做一点工作，我们商务部部长访美前，也到上海跟我们也有座谈，听取我们企业的意见。我们企业把自己事情做好，从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多工作可做。包括我们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我们企业界代表也跟王部

长提了他们的建议，包括有一些比较老的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刚才提到“玻璃门”，这些内外有别，能不能确实落实国民待遇，我们很看好现在 RCEP，这些新的区域高质量的协议，如果中国能够确实落实，对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会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商会也会尽我们有限的力量，为中美经贸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周健工（未尽研究创始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原 CEO）：我请教卜所长关于 ESG 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国际金融界、投资界对 ESG 发生很大争议，这个争议都在西方内部发生。第一们中国怎么看西方内部就 ESG 发生的争论？第二，这些争议对 ESG 标准的影响如何？

卜永祥：关于 ESG 的争论我了解不多。西方投资人越来越重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因为西方有一个责任投资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国家实行责任投资，实行 ESG，同时考虑到 ESG 的因素。我国政府的一些投资管理部门，也开始考虑在外部基金更多引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标的。我不太清楚您说的争论。

周健工：关于绿色标准，现在有争议的，很多公司号称打造了什么标准，后来被质疑是被“洗绿”的。还有关于所谓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中间衡量的标准，是不是真实使用绿色能源等等。这种争论对标准进一步完善会不会带来推动？比如有些产品 100% 用绿色电力，但是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了非绿色电力，后来买了很多碳积分，特斯拉就反对这种做法。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标准？

卜永祥: 绿色金融是比较新的。关于绿色金融标准，包括哪些投资项目是绿色项目，其实是有一些意见的。国内认为清洁能源、核电都算是绿色项目，但是欧盟就认为煤炭清洁利用、核电都不算是绿色项目。大家可以形成一些共识，也可以把这些东西排除在外。比方一些纯绿色的东西，像风电、太阳光这些没有争议，还能够在有争议的项目之外，找到那些没有争议的绿色项目。作为投资人，这些项目的回报可能超不过其他项目，但是你做这些项目还有额外的社会责任收益。做绿色金融的人都有这种使命感，他们那个圈子非常 happy，做了金融之外还成就了类似于公益的活动，大家都 very happy。对于投资人，同等条件下他们更多倾向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乔依德: 最近欧盟通过了边境碳税，这个有很大争议。尽管可能从长远发展来看有道理，但是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包括对我国是有很影响的。这个确实很重要，也是以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专题二：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杨盼盼（主持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副秘书长）：今天的第二个专题是“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今年以来，在国际上出现一些动向，关于货币多元化的呼声体现在各种领域，如何客观分析这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下，也有人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在原来基础上增加新的动能，进而推动上海自贸区的创新？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发言人，花旗银行（中国）副行长杨骥先生。

杨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状况与推进途径

杨骥（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金融市场部中国区总经理）：感谢论坛给这么一个机会，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观察。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人民币全球化，在花旗内部，包括各个外资银行和海外机构，大家都在讨论，到底它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

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支柱，先分析一下过去三年这三个

支柱的发展状况。同时借中国跟美国在这三个支柱方面的一些数据的对比，我们有一些观察。

关于三个支柱，贸易支付是其中一个支柱，投资功能是一个支柱，再一个支柱就是储备功能。如果某样货币是一个全球化的货币，它在全球的贸易支付、投资以及储备方面一定会是有很大占比的货币。

首先看人民币，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应该始于 2009 年。根据我们的观察，作为外资，实际上最先拥抱人民币全球支付的不是国内的公司，而是海外的公司。很多跨国公司从 2009 年开始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结算。为什么会拥抱这个？因为这会减少总部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和美元的外汇风险。如果我以人民币计价的话，整个风险都会减少，还便利全球总部集中管理外汇风险。比较中国跟印度，我们在贸易货币功能上应该比印度提前很多时间。印度还是以印度货币为主，有很多管控。如果我们从贸易支付进行中美比较的话，虽然从 2009 年到现在已经 14 年了，按照 2022 年 SWIFT 的数据，在全球支付使用占比里，人民币占有 2.14%，美元占 41.81%，是 2% 对 42% 的概念。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投资货币。如果讲到跨境的新举措，中国应该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最有创新的国家，我们 2002 年有了 QFII 支持海外投资者投进来，2006 年有了 QDII 支持国内投资者投出去，2011 年有了 RQFII 支持人民币从国外投进来，2013 年有了 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制度），此外我们还有股票通、债券通、基金通、债券的北向通和南向通，包括今年的互换通。总之，在投资货币这个领域，由于我们的资本项目不开放，但是又想拥抱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有很多的创新。一方面保证了开放的稳步进行，另外一方面增加了很多理解上的要求、法规上的要求。对比一下占比结果，中国现在整个债券市场的海外投资者占比大概在 3%，美国债券市场的海外投资者占比在 2021 年是 26%。股票市场上，我们北向通，包括 QFII，到 2021 年海外投资者占中国股票市场的比例是 4%，美国是 15%。这是中美从投资货币的对比。

另一个就是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就是全球各央行用人民币作为储备，目前来看，中国在 2021 年占全球的 2.7%，美国占 59%。

这三个支柱总结下来，我们观察到，在过去若干年经过大家的努力，人民币越来越重要，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就全球金融体系来讲人民币也是越来越重要，不可忽视。人民币从没有什么地位，现在我们第 5 名，而且我们跟第三名、第四名很接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看 41% 对 2%，59% 对 3%，我们还很难说实现了国际化。这里应该有很多的路要走，这是第一个观察。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海外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策略师，他们会觉得人民币如果想取代美元，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我们政府可能没有人民币要去取代美元这么一个想法。人民币资本项目是没有开放的，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政府并不一定会

愿意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因为在历次金融危机里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有学者估计中国什么时候会开放资本账户呢？如果中国 GDP 是美国的 2 到 3 倍，中国会开放资本账户。

如果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双赤字，中国会不会愿意实现双赤字以达到一个国际货币的结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政策和透明的、公平的法律环境，大家才会认定你作为全球的货币。一定要有一个深度的资本市场。一些国家在采购能源时用人民币结算了。实际上国际市场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拿了这么多人民币，这些人、这些国家持有人民币去做什么？持有美金可以买它的债券，买它的股票，有很多标的，它的资本市场是很深很宽的。但是我们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海外的人去买呢？大家有争议，例如可以买中国的产品，我们在上海有能源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可以拿石油换人民币，换黄金。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举足轻重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结合我们国家高层战略，中国要从一个间接融资市场发展到直接融资市场，也就是从双边贷款、银团贷款，发展到未来发债、股票 IPO，这个方向已经说了很多年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能否实现，要加大人民币的资产值，加大人民币资本市场的深度，这是高度相关的。

香港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从 2015 年以后实际上量不断缩减。我们怎么在国家大的战略情况下去发展市场？要进

进一步深化和拓宽债券通、股票通等相关产品和范围，每个开放都会带动制度化的变革和新产品的介入。举个例子，比如说债券通，如果海外客户投到中国来，按照国际的惯例，投资以后要做对冲。我们在上上周宣布了北向互换通。海外投资者投到中国债券市场，面临了一个债券波动的风险。

硅谷银行之所以会破产，也是因为它买了债券以后，有一个市值的风险。如果债券涨了，你就涨；跌了，你就亏损，这跟利率有关。美国市场利率一直在涨，美联储加了 10 次息，所以债券市值实际上是直在跌。但是市值是一个纸面的盈亏，如果你不去卖掉的话，不会有真金白银的损失。但硅谷银行的状况就是因为大家挤兑，它没有钱，本来纸面上的盈亏就变成真金白银的损失。

再回到海外投资者，对他们来说，投资持有一张债券，投资的是一个利息。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包括银行的交易部门，买一张债券的同时会做一个对冲，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敞口面对市场，所以有一部分比例会做一个收回来的利息。过去没有北向通利率互换的时候，市场投资者是在海外做一个非交割的人民币利率互换。两周前开放给海外投资者一个参与到在岸人民币利率互换的市场，虽然我在海外，但是参与到国内利率互换市场来对冲债券风险。如果我买一个债券，假如说利率上升，我的债券跌了，可能 80% 已经通过利率互换规避掉了，所以我的敞口并不是 100%。国际上规避债券风险并不是用利率互换，这是另一个我们国家需要去开放的东西。在实际市场上，大家用利率的期货，

如果我买国债，我就会用国债期货去平掉我的风险。但是目前在中国，我们国债期货并没有开放给所有的国内参与者，只有五大行和有限的保险公司，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海外投资者都没有被批准用国债期货去规避国债风险。

如果一个海外投资者进来，市场本身需要做多大的变化来适应海外投资？海外投资者是高度专业的，主权基金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他们有一套很完整的利率管理制度。同时，市场进一步该如何发展，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还是举债券的例子，要做避险，要用人民币利率互换，无论是非交割的或者交割的期货，或者国债期货。另一个问题，我拿了债券以后，虽然有一个利率收入，但是在海外拿了债券以后还要做逆回购，海外回购市场都是以权益转让的方式买断了。比如我们做一个回购，我把债券给你，你给我一个收益，我给你的时候这个债券就是你的，权益已经转让了。但是在中国 98% 都是所谓的质押，债券给你了，但是债券所有权还是我的。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探讨，这是整个法律框架的问题。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从投资货币这个支柱来看，债券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以后，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国际惯例去做的话，这里边有很多的工作，很多新的产品，很多法律框架需要大家进一步去探讨，跟监管去沟通怎么去做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增加深度的话，要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的政策。所有的金融开放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变化，现在的

状况是人民币利率很低，美元利率很高，和三四年前的市场完全是相反的。现在所有的负债都想在中国支付，因为利率很低；所有资产都想拿去海外，因为海外利率很高。但对于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来说，因为中国有资本管制，所以这个钱拿不出去。实际上市场本身有很多衍生品交易，虽然钱在中国，但是通过这些基础的衍生品，比如债券通、南向通，利用新的开放制度和衍生品交易，可以让国内投资者享受到和海外投资一样的高收益。

人民币还是一个融资货币，大家都想办法在中国借钱。这两年“熊猫债”慢慢回温，还有 QD，为什么 QD 这两年这么火？因为海外利率很高，大家都想通过这个渠道参与到海外市场。我们所说的开放也好，产品也好，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变化。所以我们跟一些监管领导谈到，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开放的举措，海外投资者都不投进来？不是我们制度做得不好。我们能不能在海外增加人民币资产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海外人民币能够有更多的资产。比如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举措叫作港币 - 人民币双柜台模式。中国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以后，能够去发一些人民币计价的东西，在海外如果有很多人民币，就能够去买人民币计价的股票。

总的来说，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它对于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开放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怎么建立一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怎么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在岸金融市场。刚才提到北向互换通、北向的期货，怎么按照中国特色和国际标准把更多国

际机构引进来？实际上有一个契机，就是借助一带一路，包括现在与我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开始，逐渐扩大人民币影响力。还有数字货币，海外人民币市场等等，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探讨。我们有一个更加可预期的、稳定的政策，不断健全金融市场有关法律规章。同时，让全球市场不断享受到中国发展的好处，自然就离人民币国际化那一天越来越近了。谢谢大家！

杨盼盼：感谢杨行长的精彩发言。杨行长非常实务，也从学理角度给我们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梳理，还提出非常多的务实的好建议。

接下来有请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成员张光平发表演讲。

张光平：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和动力

张光平（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成员）：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朋友们，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一段时间我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一年多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原因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捷报频传。2022 年 10 月，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公布一次的全球外汇交易数字显示，2022 年 4 月人民币日均成交额首次超过澳大利亚，首次成为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也正式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货币。这与 2021 年出版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产品创新》第

10 版的结果完全吻合。这也是多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最好进展。

2019 年到 2022 年这三年来，与上一次公布的数字相比，人民币从全球第八货币提高到第五货币，平均一年提高一位。很多人说一年提高一位，再过三年，2025 年人民币就可以提高到全球第二大货币，我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越往上走的每个台阶越不容易。

这一年多来，人民币国际化捷报频传，社会各届对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关注的重要原因，源于中国与俄罗斯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带动了人民币的结算，巴西、伊朗、沙特、印度与俄罗斯的一部分石油交易也使用人民币。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又有报道称中国和巴西加强合作，东盟国家加强使用人民币等一系列消息，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消息，应该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提高的作用。

但是，前面说了这么多国家，俄罗斯、伊朗、沙特、印度、巴西，甚至包括东盟，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其货币在全球外汇体系市场的流动性相对有限，虽然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推进作用，但是作用应该相对有限。比如六七年来，中俄合作范围持续扩大，合作的承诺也在加剧，但是外汇市场交易却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就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的推动，主要交易量还是在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交易，这比其他方面的交易量大很多。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好消息，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在两个重要领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全球广泛关注的 SWIFT，

反映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一年多以来基本上保持在 2.3% 上下的水平，排名第 5，与 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排名相当，但是与第 4 名的日元占比，仅相当于日元结算占比的一半，这一年多来也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跨境结算是货币国际化最主要的领域。货币国际化另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一个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里的地位。根据刚刚公布的 2022 年四季度数据显示，2022 年 4 季度人民币结算占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到 2.69%，主要是因为美国加息所致。这也反映了刚才前面说的，在全球跨境结算和货币储备里，人民币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下面我主要通过比较一个数字来反映货币国际化最大的动力是科技。2014 年我国货物贸易超过美国，创造了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额。2014 年到 2019 年，中国货物贸易超过美国的幅度接近 10%。2020 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中国货物贸易超过美国 33%，2021 年超过 21%，我国的货物贸易在全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由于疫情原因，我们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2020 年四季度首次超过美国；2021 年保持了超过美国的地位；但是 2022 年由于美国货物贸易突出增长，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又低于美国。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 2020 年到 2021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31%，这是非常可喜的惊人数字。但是关注不太多的是另一个数字，在货物贸易大幅度上升的同时，2021 年人民币货物贸易结算占比不增反降，从 15.4% 下降到了 15.2%，这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大部分货物贸易不是中

国自己的货物贸易，而是外资企业的货物贸易。由于在中国的美资企业继续使用美元结算，日资企业继续用日元结算，德国、法国这些欧元区国家继续用欧元结算，英国和瑞士继续用英镑、瑞士法郎结算。货物贸易虽然大量增长，人民币货物贸易结算占比却不增反降。

更进一步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货物贸易出口产品的科技自主含量越高，用本币结算的可能性越高。我们的科技含量还有待提高，我们货物贸易大量增加，人民币结算占比却不增反降，这反映出推动货物国际化的真实动力是科技国际化。努力提高科技自主自强能力，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全球到现在为止，对科技都没有精准的度量，因此科技对经济，对贸易，对外汇交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都不足谈起。

2021 年，我的人民币国际化第 10 版，首次对一个经济体的科技自主度进行了度量。科技自主度用什么来度量呢？任何一个经济体，知识产权出口使用费占知识产权进出口比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自主度。出口相对于进口越大，知识产权顺差越高，这个国家科技自主度就越高。知识产权顺逆差都是 0，科技自主度为 50%；如果知识产权是顺差，科技自主度就超过 50%；如果知识产权是逆差，科技自主度就小于 50%。我正在更新的第 11 版，对科技国际化、科技自主度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完善。根据前面的定义，2021 年我国科技自主度首次超过 20%，达到了 20.1%。2022 年首次达到 23%，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5 年我们科技自主度

只有 4.87%。这几年我们科技自主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 20% 还不到相对自主 50% 的一半。2021 年和 2022 年，我国知识产权逆差排名仅次于爱尔兰，全球排名第二，说明我们科技自主度还有大幅度提高的空间。

只有科技自主度提高到接近 50%，或者超过 50% 的程度，本国出口贸易用本币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才会显著提高。用本币结算的比例显著提高，经常项目受本国货币影响的程度就会越高，国际化程度才会相应提高。

多年来全球研究货币国际化都停留在资本项目、贸易项目，停留在国际货币储备这样一些内容里面，对科技源头的关注力度还不够。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每个国家科技自主度、科技国际化、科技总体的度量，有了这些度量的结果，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一个国家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科技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对经常项目的贡献，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力，这应该是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之源。

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比 2019 年提高了 3 位，2025 年能不能提高到第二位？三年内基本上不可能实现，2022 年我国科技自主度刚刚达到 23%，三年内要达到 30%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排名第 4 的英国的科技自主度接近 60%，日本科技自主度达到 62%。所以要达到 60% 左右的科技自主度，不光是三年内不容易达到，10 年内达到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等方面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动力是科技自主程度有持续扎实的提高，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今后随着国家加速创新性国家建设，我国科技自主度会以更加高的速度提高。科技自主度提高了，我们金融自主度也就提高了，货币自主度也提高了。

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

杨盼盼：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张老师把货币国际化研究拓展到科技领域，而且给出了非常好的内在含义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走势的预测。接下来有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发表演讲。

刘晓春：冷静看待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谢谢论坛的邀请，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前面杨行长和张参事讲得非常好，给我很多启发。这段时间关于去美元化讲得比较多，在这中间大家看到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更好的希望，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怎么来看待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我们还是要冷静地来看待。

一般来说，美元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霸权，一是它的经济体量、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包括二战以后在国际上做的制度安排，都有助于美元成为一个霸权货币或者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当然，我们许多专家也会说，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起码应该是第二位的国际货币。但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类比。

回忆一下，上世纪 90 年代末，97、98、99 年，欧元要

推出来的时候，当时国内外专家都估计欧元至少将和美元并驾齐驱。欧元区美国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GDP、科学技术等对比下来，加上当时欧洲发展趋势非常好，他们认为这两个货币应该是并驾齐驱的。欧元推出来以后，我们也曾经希望在美元和欧元之间做一个平衡，包括 2005 年汇改在美元汇率中吃了很多亏，所以不少企业为了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持有欧元，20 年过去了，欧元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一个货币能否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体量、贸易量来算。可能有另外两个相对更自然的因素，导致美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除了刚才讲的原因，经济体量、军事实力、政治实力都是。我 80 年代末开始做国际业务，当时国际化主要指的是贸易的国际化，也就是说我国生产的东西，能不能卖向全世界，叫国际化或全球化。但是计算机广泛应用后的全球化，是指整个经济、整个产业链的全球化。一个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整体上就是全球化。和原来生产区域化、销售国际化的国际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产品本身从设计到生产的部件，最后到产品销售，是在一个体系内。体系之间交换、计价、核算，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工具，才会更有效。

我国一开始做国际业务的时候，我们向德国进口设备一定用德国马克，向法国进口设备用法郎，向日本进口纺织设备用日元。因为设备都是他国生产的，所以我们当时做结算时，基本上是分开的。当然美元相对使用的多。但是到后面全球化形成以后，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美元来做贸易

了。可以这么说，之所以美元在这 20 年成为更重要的国际货币，中国做了很大贡献。因为我们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贸易几乎都是用美元计价，很少再用日元、欧元来计价。全球化下，经济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集中，并不是美国主动的。好比说人民银行发了 200 多张第三方支付牌照，但大家手机上只有微信和支付宝，因为要大家都有的才能互相通。另外 200 多个因为互相通不了，干脆就不用了。这是自然集中的过程。所谓平台垄断不能简单按市场占有率算，因为这是经济习惯性动作。还有一个原因是跨国企业，比如说苹果作为一个企业，其生产布局是全球的，不可能说和中国的企业按人民币来计价，和德国的企业按欧元计价，一定用一个货币计价、交换，这样管理才能更有效，也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观测到全球化对美元拥有现在地位的作用，再来思考我们怎么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非常赞同杨行长讲的，美元有非常开放、非常丰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使得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买东西，除了投资企业，还可以进行金融交易。作为国际货币能不能在国际上成为等价物，这就是国际化的标志。为什么欧元没有这个水平，和这两个方面都有关系。欧元结算占比有 30% 多，但包括了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结算。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结算也是跨境结算，但是这与欧元区和中国之间、欧元区和美国之间的跨境结算，不能同日而语。排除这一块，欧元结算占比可能没有那么高。

我们要冷静来看待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这两个自然的经

济行为和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不仅仅要看到所谓霸权现象。

我们也要冷静来看待现在去美元的契机，也包含两方面。一是最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做的所谓制裁、长臂管辖一系列动作，毫无疑问损害了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包括国际金融体系的信誉。我讲这话不仅仅是从我们受损害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欧美银行也想在一定程度上逃离美国的制裁，因为他们也要想正正经经按规则来赚钱。所以欧洲在这之前就搞了和伊朗之间物物交换的结算体系。这本身是一个契机，但是这个契机有多长？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有没有能力修复这样一种信心？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冷静地来看待这个过程。

二是这两年地缘政治的冲突，全球化发生了逆转，今后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区域化基础上的全球化。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融通的货币？我们既看到有巴西、沙特讲要用人民币，也看到东盟这样的群体说要去美元化，要用本地货币。东盟不可能反美。实际上如果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在一个区域内的话，毫无疑问我们要用本币。这方面也是一个趋势，或者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契机，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我们怎么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我们不要唱得太高调，应该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货币的基础上，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信心，让市场或一定区域内的市场，更多地选择人民币而非其他货币。因为在去美

元化过程中，相信所有国家或者主要经济体都会考虑到其主权货币的利益和地位。比如说俄罗斯，我认为俄罗斯一直对我们有所防备，很希望避开 SWIFT 系统的架构，又很提防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架构，希望用卢布的体系。但是从直观来讲，我们不可能用以卢布为主的结算体系。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有技巧，要有测算，在尊重其他主权货币的同时相信市场的力量。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键是要进一步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丰富我们的金融产品。要让人民币持有者有更多、更自由、更方便的选择，这样人家才会乐于持有人民币。这才是最根本的，而不是简单地在贸易领域里硬推用人民币来结算。

由此带来第三点，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外汇管理水平。今后我们的外汇管理要站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常态化波动的这一个背景下，来管理我们的外汇，包括对一些问题评价。比如汇率变化，汇率上升有利于进口，汇率下降有利于出口；汇率的上升可能有利于资本流入，汇率下降有利于资本的流出。我们以前是缺外汇，所以我们传统的观点是招商引资的观点，总觉得流出是不好的。我们今后对流入、流出要重新建立观点，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我们怎么来管理资本，或者资金的流入流出，包括人民币资本的流入流出，外汇资本的流入流出。不是简单讲资本项目开不开放，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资本流入流出，建立什么样的资本流入流出管理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开不开放。有的时候谈不谈没有关系，你管好了就无所谓开不开放，这个非常关键。

我们要提高外汇管理水平，包括境外人民币，而且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站在我们国内的角度来看待外汇的管理。谢谢大家！

杨盼盼：非常感谢刘院长，他从一个非常客观理性的视角，对去美元化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特别是他从全球化价值链和金融视角来讲美元在短期内不可替代的地位及其最近的变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接下来有请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曹文炼先生。

曹文炼：金融对外开放的回顾及未来展望

曹文炼（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感谢会议主办单位的邀请，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今天上午听到的信息量很大，感觉这个论坛办得很好。

我首先评论一下上午的发言，大家的主题是在回顾过去的金融开放。我从 80 年代开始长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也参与了我国国家重大开放的进程。因此我有这么一个看法，金融的开放是适度滞后于经济的，从过去 45 年改革开放进程来看，我们把控得很好，金融相对滞后经济开放进程，金融的开放要跟实体经济开放相适应，就跟我们现在强

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样。

今天上午屠市长讲到 19 号国务院文件，在 2008-2009 年，当时屠市长在上海市主管金融工作，中央筹备了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会前由当年的国务委员牵头分了几个专题组，分给国家发改委的是金融对外开放组。这个组是由我具体牵头负责组织的，带了一行三会的同志调研了很多次，把上海作为调研的重点。开完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屠市长高度重视，组织上海金融部门跟我们介绍情况。后来形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文件，也是我所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跟上海市有关部门共同起草的。我记得 19 号文件强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标题就写的是国际金融中心 and 先进制造业中心，还有国际航运中心，是并列提的。

回顾过去 45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金融的对外开放还是很成功的，把控得很好，总体上相对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开放。

我前 20 多年在国家发改委主要搞金融财政政策的制定，后 10 年主要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智库建设。从我所参与的工作来看，我感觉在 80 年代，是我们对外开放的 1.0 版。我前两年受央企邀请讲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专门查了一下，党的三中全会文件里并没有对外开放，我们现在都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 1978 年三中全会决定的，三中全会那时候的对外开放还是非常谨慎的，文件里讲到要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讲到改革但是没有讲到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大概在 1981 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查过那时候的一个文件，慢慢才形成。80

年代对外开放，1.0 版主要就是搞特区建设，沿海城市的开放，那个时候金融没有开放，没有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进来，那个时候搞国际大循环，发展对外贸易。那个时期，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通过沿海的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促成我们后来的改革。

90 年代可以算 2.0 版的开放，特别有标志性的是 1993 年朱镕基主持领导的财税、金融、外贸、外汇改革。我本人全程参与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争论最大的是风险能不能把控。在座的同志都能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计委管外汇，专门设有一个外汇处，每进口一笔钱都要得到国家外管局审批，那一轮改革非常重大，甚至超过了后面大家讲的加入 WTO。加入 WTO 是前期这些改革开放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前面具备了跟国际接轨的制度基础以及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后面才有我们加入 WTO。回顾过去 45 年的改革，1993 年那次改革是最重要的，93、94 年的改革也是最成功的，是唯一一次配套的成功改革。

回想当时的形势，也是内外交困，国内高度通货膨胀，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危机，当时发改委还管印钞厂的印钞计划，我们那时候造币都来不及。在那个情况下，加上 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那时候内外形势比现在更危险。在这种形态下，我们才有了各方面统一的认识，要推动配套改革，而且进行了一次很成功的分税制改革、外汇的并轨、投资体制的改革等等。那次改革后面紧接着国有企业一系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都

是在 90 年代基本完成的。

回想一下，进入 2000 年以后，如果加入 WTO 为标是 3.0 版，这 10 年没有太多重大的制度改革，主要是一些与国际接轨的细则。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我主编过几本书，还主编过中国对外开放指数，连续 3 年在博鳌论坛上发布，当时满有影响的。还主编过第一套《一带一路》丛书，包括对外开放历史研究等。2000 年以后，借用上午屠光绍市长的话，对外开放 3.0 版主要以加入 WTO 为标志，我们跟国际规则接轨，引进外资，特别是从 2000 年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

但是，从 2015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中美博弈日益尖锐，一定意义上严重影响我们进一步加入全球化以及跟国际规则接轨的进程，包括今天上午多次提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事情。要是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很可能香港回归后下一步的事情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亚洲金融危机一来，使我们在金融开放上更加审慎了。

我记得中美关于贸易逆差、顺差的谈判在 2004 年 -2005 年，也曾经有集中讨论要把资本项目提上议事日程。2011 年我刚加入智库，当时领导也让我们研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课题，那时我们还比较乐观，我觉得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可能的，还没想到后来中美贸易会这么尖锐。坦率讲，谁也不敢讲什么时候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是可以研究、探讨的。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下，第一个观点，就是我

们金融开放始终是比较谨慎的。90 年代才开始有外汇金融的进入，包括资本市场开放也是非常谨慎的。我记得加入 WTO 的时候，最艰难就是外资在金融开放上的突破，后来朱总理先开放保险，也没有全部开放，始终是根据我们国情和制度把握金融的谨慎开放。我在国家发改委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未来也是这样。未来的金融对外开放，首先也要跟我们整个国情、制度和国家产业安全发展相适应。

第二个观点，即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包括金融开放的重点。今天上午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向东看，向西方发达国家看，怎么跟他们对接，这是必要的。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4 月份刚刚在香山开了春季会议，我也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下一步改革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力。我认为改革和开放下一步要着重向中西部发力，要消除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从 1978 年到现在，我们总量指标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我们一些重要指标有三大差别，中西部和东部的差别，城乡的差别，还有贫富的差别。这三大结构性指标不仅没有太多改善，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和贫富差别这两个指标比 1978 年更差了。所以，我们提出“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快消除这三大差别。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 70%，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做了一个研究，表明多数国家城乡基本没有什么差别，差距不大。我们在上海可能感觉不到，因为上海周边已经城乡一体化了，但是你要去西部看看，包括去重庆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今年去了两次重庆，重庆郊区和重庆

市区差别太大了，我去了新疆的和田，那里工资很低，只有两三千块钱。和田仍然是全国最穷的地级市，主要靠转移支付和大量的对口支援。

东部当然要继续提高质量，长三角、粤港澳，我个人觉得要顶住以美国为首的压力，要改善外资。我两周前参加巴菲特投资大会，在美国呆了 12 天，也看了一些老朋友。美国很快要出台对中国限制禁止投资的国会议案了。我在硅谷呆了 5 天，在科技上硅谷企业已经与我国脱钩，我们要尽量争取不脱钩，虽然有一些脱钩是难免的。扩大东部开放和提高开放质量上，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但不要光盯着美国看。为什么现在韩国和日本跟美国这么紧呢？还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这两年我们强调国内芯片自主，搞得原来韩国出口中国的芯片市场都丢掉了，现在韩国贸易跟中国萎缩这么多，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政治上就往美国那边靠。日本也是这样，我跟日本官员交流过，为什么中日韩之间的自贸协定实现不了。日本官员跟我讲，日本企业觉得跟中国有很多同类竞争，日本产业结构跟中国互补性不大。所以，我们怎么在东部地区进行经济改革非常值得研究。我们能不能先对日本、韩国的金融机构开放，包括金融产品，吸引他们到我们这里上市、融资，配合外交多做一些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当然美国也要积极争取，虽然美国不愿意跟我们玩，那我们不要把其他朋友看成跟美国一样。美国人来跟我们提中美贸易逆差，能不能中国多进口美国的一些产品？当时我们主任就回一句话，美国先把对中国的出口，特

别是科技管制放松到对欧盟和日本的水平，中美就可以平衡贸易。美国过去在科技上对我们的限制和管制一直比较严。今天上午有一位同志讲到，要扩大对西方国家的进口，我们外汇储备那么多，特别是设备更新改造、扩大投资等等，不要什么都搞进口替代。如果我们对外依存度不那么大了，人家也可以不要你这个朋友，就跟着美国走了。我对东部主要是这么一个看法。

我重点讲讲对中西部怎么发力。我前不久参加重庆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主要看看陆海新通道。新加坡在重庆的第三个工业园，每年都有中新高级研讨会，探讨优先让什么企业上市。我做了一个公开发言。对于重庆、成都，我建议大家要抓一件事，即争取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再设一个交易所。现在就西部还没有交易所，北京设了交易所，重庆要想办法争取一个。能不能把国际版设在西部呢？本来交易所就不一定是有形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写入了国务院关于成都、重庆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规划，也提上议事日程，对缩小地区差距很有好处。上面讲的三大差别，如果在 2035 年前不缩小、不消除，实现现代化基本无从谈起。

在金融创新上，要重新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前几年我讲国家开发银行的重点使命，因为当时西部一些省份来找国家发改委，希望成立一个西部开发银行。我们提了意见，把国家开发银行改成西部开发银行，不用再设了，重点向西走很有必要。还有金融机构用什么方式贴息，西部地区发债券能不能财政贴息或者财政给担保？西部地区发债评

级很低，投资成本很高，现在发西部债务特别贵。但是西部地区如果不搞基础设施建设，绝对发展不起来。

我这次去了美国两个州，都不靠海，原来都在沙漠上，现在都建设得很漂亮。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现在是美国第五大城市，因为硅谷成本高，科技企业都往那搬，台积电就坐落在亚利桑那州。历史上跟新疆、甘肃一样，都是荒漠地带，现在建得很漂亮。中国如果再不建设西部，人口就都往东部流，财富都往东部流，而中西部面积占整个中国国土面积近 90%，人口大概只占 40% 几。当年美国发展，主要是投资银行把欧洲的资金弄到美国，所以美国才会发展，美国东部发展也是靠金融机构的力量。中西部发展也要靠发债券。要多支持西部发展，过去公司都是注册在深圳、浦东，税都很低，现在应该注册到西部，让证券公司、投行享受税收优惠，对外资应该给更大的优惠力度。我这些年搞一带一路，也去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他们都给外资很大的税收优惠力度。因此除了向东看以外，扩大开放、金融创新还要向西看。

最后一点，要重视民间投资，加强中西部现代城市化。东部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我前不久在昆山参加一个会，那里跟上海一带没有差别。但是南疆的城市化率还不到 30%。我们能不能在西部地区做一些小城镇建设，给它一些特殊政策，让民营企业、房地产商去投资开发。有人说新疆发展有水资源问题，最近我们就水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完全有条件接水和调水并重，现在从疆外调水只要 1400 亿，不到 5 年

就可以建成。今天在上海借这个机会，呼吁对西部发力。谢谢大家！

杨盼盼：非常感谢曹司长。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之后从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从全国开放的全局视角，讨论了金融开放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非常高瞻远瞩的思路。

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老师发言。

张宇燕：国际分工、新能源、人民币化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学术委员）：这个题目讨论了很长时间，我就借这个机会，谈谈我最近对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些想法。

一周多前，我去上海商飞做了一个调研，就是我们的大飞机项目。这次调研感触最深刻的就是，像飞机这种知识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已经到了如此细腻的程度。一架飞机要三四百万个零部件，分工特别细。看了飞机整个制造过程的感觉就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这是我最明显的一个感觉。比如说发动机，上面一个减震垫圈要一万块钱人民币，如果这个垫圈出了问题，整个发动机就没有办法工作，依存度如此之高。对外开放，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更高水平、更大规模、更全方位地开放，特别

是制度性开放，这是一个必由之路。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今天上午我到清华参加了一个会，涉及到能源结构、能源转型，我比较关注能源、减碳等问题。我今天听到很多数据，还是很吃惊。绿色能源发展的速度之快，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速度之快，对我们对外开放，以及我们金融，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在这里说几个数据，2 年以后，电动汽车 10 分钟充电，充完电跑 400 公里，这应该是大概率事情。波音、空客到 2030 年，已经不再生产燃油发动机了，飞机发动机慢慢全都转向电能。整个发动机系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了，电直接驱动螺旋桨。这对整个产业结构引起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能源最后基本上都转成了光伏、风能。我看到最新的数据，全球绿色能源理事会预测，2024 年光伏就超过水电，2026 年超过天然气，2027 年超过煤，成为第一大电的来源，就这么个发展速度。这对产业结构，包括化肥、石油，中西部那么大的光伏资源等等，整个结构会发生变化。大的能源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在股票市场上的影响，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预测，到 2040 年中国可以关闭全部能源进口，煤、天然气、石油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个影响就非常巨大。

刚才说到分工，全球能源分工全部关闭，那么我们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在这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另外一个，今天说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开放，大家谈

得比较多的是所谓去美元化进程，前面发言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确实去美元化进程在加速，但不能由此得出到了美元很快就让位给多元货币体系，我觉得作出这个判断为时过早。这里面不光是美元本身的问题，还有其替代者和影响力的问题。在货币这个问题上，很多选择不是在好和坏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进行选择。美元还是没有替代者。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跟日本明治大学开了一个会，讨论金融开发问题。在那个会上，我谈了一个词，我更愿意用一个概念 *yuanization*（人民币化）而不用 *renminbi internalization*（人民币国际化）。我说完了以后，日本教授马上提了个问题，你用 *yuanization* 而不用 *renminbi internalization*，是不是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发生变化？我当时跟他调侃，我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太长，不如用人民币化。其实，这个词的变化为还有其他的想法，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站在“国际”的角度，我们跟蒙古、泰国、越南，包括俄罗斯，都使用是国际化。人民币化，我想更强调它的“全球化”，把它做成一个全球的货币。

我就简单把最近一些想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想占用大家过多时间。

杨盼盼：谢谢张老师。我们这一节讨论到此结束。

专题三：外资流向实体经济，建设硅谷型科技创新生态圈

郑培源（主持人，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大家下午好！我是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的郑培源，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主持第三个专题。经过上午及下午前半部分的讨论，我个人收获非常大。第三个专题叫“吸引外资流向实体经济，建设硅谷型科技创新生态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外资的引进以及我们的科技创新。主办方精心邀请了七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围绕这个话题带来他们的观点和思考。首先，我们邀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社》秘书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联盟秘书长陈东升先生，掌声欢迎！

陈东升：促转型、扬优势、增动力、补短板、强协同

陈东升（《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社》秘书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联盟秘书长）：这个环节的主题讲的是吸引外资，建设硅谷型科技创新生态圈。我们国家发改委搭建战略体系，包括战略新兴产业。金融和资本、和实体经济发展、

和我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人工智能、产业完备的配套能力这块，我们提出要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体系。重点在几方面：促转型、扬优势、增动力、补短板、强协同。

第一，促转型。要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加快高水平应用智能制造业技术推广，稳定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有人认为国家发一个文件，发改委发一个文件，跟我们关系不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发改委发了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把洗车和洗衣服设计到了一起，上边是洗衣服的车间，下面是洗车的车间，洗衣服的水净化可以洗车，不留废水，成为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一个重点实施项目。为此我们还成立了节水工作领导小组、节水标准化委员会。他们周一要来青浦看装备的制造、生产、研发。我去深圳时，深圳领导说先投 5 千万建一层楼，把研发放到他们那。大学的节水，军队的节水，都顺着这个项目下来。这就是读懂了国家的节水行动方案，包括地方区域发展。其实我们都在不断招商，增加资本吸引力。我们一个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做出这么大一个产业链，在促转型方面有很多机会。

第二，扬优势。我们有很多优势要发扬出来，重点推动石化、汽车重点领域布局调整，鼓励企业提高先进产能比例，有效扩大优质供给，提升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承认我们大飞机生产制造水平、配套能力必须和国际接轨，但是小飞机就不一样了。我们发改委批了国家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

划，调研发现我们传统汽车制造能力这几年提升很快，技术水平非常高。如果我们转型新能源汽车这么多，传统零配件企业怎么办？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为此，我专门去了几家航空公司调研，也让中国电科用芜湖、奇瑞汽车零配件把小飞机造出来了。中国的产业发展是充满活力的，不管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基金、银行，都要充满信心。我们把洗车和洗衣服结合就是一个大的产业链，下一步也在研究汽车跟通用航空小飞机的结合。

第三，增动力。要持续打造发展引擎，大力推进新能源、新装备评论：有一部分省，一个省级国有企业还不上债，省领导让另一个省属国有企业还钱。甲乙丙丁转了一圈，本来有的国企还可以，A 债 B 还，最后几乎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拖下水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每个地区都谈几项，但是要能抓住核心和逆向思维，创造自己不一样的工作蓝海。我去山西说数字物流，怎么能无中生有，怎么做数字物流？原来山西煤运到宝钢，是由炉料配比各种煤运输，宝钢要储存 45 天。上海的环保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比山西贵得多。什么叫数字物流？把宝钢库存 45 天降到 15 天，在山西配比好就是数字物流。他们还有一条铁路，因为它的运力不够，报了几次没有批。后来把周边煤集中到一起运宝钢，就是减少物流成本，同时又能够降低污染。这就是我们新增动力，包括怎么去理解数字化，而不是简单把车间工人变成机器人。

第四，补短板。持续补齐关系产业安全发展的短板，充

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继续围绕重点产业关键环节，推行实施一大批攻关项目。咱们一天的论坛，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反复说到安全，也说数据要不要流动，要不要去共享的问题。我们也很迷茫，很多的专家、学者、领导提出来很多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学的是西方经济学，从原理上是讲得通的，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我们走自己的路，也有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社会也在探索究竟谁的路是对的。我们很多论坛、会议都是跟着西方节奏在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形成合力。要拿出我们的逻辑，老祖宗太极文化六个字“秩序、交换、平衡”，上下相生、左右相克，把这几个原理弄通了，全都能解。当时“一带一路”就提出来了，和联合国一起交换秩序，平衡欧美。

第五，强协同。要持续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我们的重复建设很多，比如说芯片，后来大家说“一地鸡毛”。地方政府不懂什么是芯片，觉得招商招来了东西，就是巨大的财力，后续新能源汽车也出现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新技术、新成果的传播中心，搞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自己开新闻发布会，因此我们要做一个方向标。我们也缺少一个强大的远程专家论证支持中心。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队，我们有国家工程中心，有几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有几千个，这些不能作为专家吗？下一步，我们要设立远程专家论证中心。可以给科创板，给头部央企，给头部上市公司，给地方政府乃至

更高决策层，提供很好的决策依据。

总书记 200 次讲话，有 57 次提到系统化思维。原来我们称改革开放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再去交这个学费是交不起的。对于很多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产业发展、招商引资，要具有针对性地帮它规划产业，按照系统化思维进行梳理。我这次来参加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包括 G60，陈吉宁书记和沿线主要书记都参加了。我们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个项目，大家都来竞争，给出不同的政策，是不是适合呢？产业要素能配得齐吗？这些都是影响我们产业发展的瓶颈。这次提出来要按照现代化体系，构建一个能够为我们国家物质和技术做好充分条件的基础。我们战略新兴产业分了 9 个大领域，40 个重点，186 个方向，涉及到的产品和服务类是 4 千多项。我们国家符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大概 100 万家，意味着我们有 100 万个战略新兴企业家。我们按照系统化思维理念，把这些短板补齐，我们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能够给经济、给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谢谢！

郑培源：谢谢陈东升秘书长的精彩发言，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讲到太极文化，又讲到了长三角战略新兴产业的实践。

下面有请未尽研究创始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周健工。周健工先生曾经是一财资深的媒体人，这几年专注于智库研究。有请周健工先生！

周健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影响

周健工（未尽研究创始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大家好！我谈一下硅谷和创新最大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大型语言模型或深耕式人工智能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个事情发展得很快，我们 5 月 7 号发了一份报告“通用人工智能、通用技术通向何方？”美国对这个技术发展方向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包括人工智能领域，还有人工智能之外的认知心理学、物理学，都对技术未来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我本来准备一个挺长的 PPT 来介绍我这份报告的内容，今天介绍时间很短，如果大家对我报告感兴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下载。

我们 5 月 7 号发完之后，今天是 25 号，20 天过去了，又有了一些变化。

第一，很多概念我们要分清楚。比如 ChatGPT、GPT、大型语言模型、通用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生成式 AI。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国家政府部门采用什么概念。网信办出了一个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办法。政治局会议谈到，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国家在这么高规格会议上采用“通用人工智能”这一说法还是满吃惊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在美国是一个争论非常大的概念，很多人认为 AGI 永远不可能实现，我认为 AGI 可能要四五年或十年才能实现。北京出了一个 2035 年计划，这个说明我们对 A 背后技术是寄予很高期待的，是

否能实现一次突破也是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感想是，大家都在谈 ChatGPT，这个背后是一个重大科学发现。我们不应该只看 Google 怎么去谈，其实很多科学家也在谈这个事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研究人类认知的学者都在谈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的一个观点我是满接受的，为什么大模型有这么强大的语言功能？是因为它发现了人类语言的基本结构。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科学发现。我们都认为汉语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事实上 GPT4 要碾压现在所有中国公司做出来的模型。你让它写一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GPT4 在汉语的简洁、清晰、通顺各方面，要远远胜于我们自己开发的模型。这就说明人类语言是一个通用的大模型，一旦你的模型大到一定程度，完全能够发现人类语言一种共性。正因为它掌握一种共性，所以它可以碾压。这一点对我们开发大模型有很大意义，我觉得在思维上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它定义了一种新的知识。中国几个顶级专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概率性的支持。我们总是有一种绝对论，但实际上很多知识是概率性的，我又称之作为一种量子化的知识，量子其实测不准，它改变我们对知识的认知。未来人类知识的产生，很可能是人机共同创造和发现的新知识。GPT 大模型出来之后，又掀起一轮对于神经网络和人脑之间智能机制的研究。大家发现两者之间相似度越来越多，它对我们认识人类自身的智能会产生一种新的参数。我们对照机器的智能，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很深奥的知识，

在机器面前可能是很浅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写文章是非常深奥的知识，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从算法的角度看不那么深奥，是很简单的、可以被替代的。所以它对重新认识我们的智能，我们价值究竟在哪里，是一种参照。

还有很多理论也引发新的研究热潮。比如说大模型的智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涌现的机制是什么？从科学机制上说，它是不是一个伪的智能？确实在美国很多学者也有这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它是一种范式革命，我们应该用新的范式来解决它。这一技术和产品还有很多的缺陷，有胡说八道、幻觉。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一边在骂，一边在使用它，一边在尝试，同时产品迅速迭代，建立自己的生态，很多补充技术也在各个领域大量产生。这就是现在发生的变化，非常有意思。科学的发现不仅仅是工程，而是揭示一种智能的本质。正因为它的智能本质，取得这样一些突破，所以我们理解它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比较大的格局和高度上来理解。汉语翻译成“智能”非常有意思，能源的能是能，智能的能也是能，我们要站在“能”的角度上，看它给我们人类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第三，从技术发展规律来看。有两篇很有名的论文，是 OpeaAI 组织经济学家写的论文，分析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的广泛影响，推出一个结论：这可就是一项通用的技术。有一本研究经济史的书叫《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比经济更是本质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当我们谈到它是一种通用技术，很可能想到蒸汽机、电力、微处理器这

样一个级别的技术。如果这样看它的话，可能引发一种技术革命。对于这种技术革命也有各种说法，比如马化腾这是一个 100 多年才能遇到的技术，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比如比尔·盖茨说，人工智能的时代刚刚开始。人工智能有 70 年的历史，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认为以前的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现在的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各个层面都在评价这个技术，说法特别多，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技术。

我们国家一直在谈数字经济，这一技术对数字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大数据。要从大数据、大知识、大模型去理解数据是怎么创造价值的，数据产业链究竟是什么。第二，这不仅仅是一个软件，而是从软件到硬件。大模型出现之后，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智能设备、智能物联网。另外还有考虑通用和多场景运用的关系，人工智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接下来就是实体经济，如果突破之后，它将带来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重要赛道，还有很多产业。

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可能引发第五次范式革命，通过经验，通过理论，这次通过智能，会对科学研究的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接下来，它会引发大量社会控制问题的争论，会不会让社会进一步失控，这是很大的问题。过度自由对民主都会产生很大问题。社会进步会不会加剧原来在平台经济里出现的这种垄断现象，加剧社会不公，也是谈论的问题。当然西方最担心的是，集权体制在面临技术挑战时可能会控制得更好，可能应对得更好。这是一个社会共治的问题。

中国、欧盟和美国都在研究相关的政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硅谷那些创新者，跟我们是不同的，他们喜欢谈一个口号“代码就是法律”。他们把一些公平和公正问题做到算法里，为它的大模型训练的时候，设计进去一个所谓大模型宪法，也有体现人类智慧的一些算法。在各种等领域，用技术来解决问题，这也是硅谷的一种思维。

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是引智，这轮革命是精英科技人才创造的，跟资金没有关系，就是你找到这群人，可能就引发了一场智能革命。

郑培源：谢谢周总，感觉听了意犹未尽。周总讲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像一颗小石子投到非常深邃的湖里，希望您有机会把相关资料分享给大家。

下面我们邀请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邵春堡先生。

邵春堡：关于创业与投资的热土、魔鬼和秘诀

邵春堡（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今天参加国际论坛，对我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同投资者深度交流的一些认识，就是热土、魔鬼和秘诀。

首先，中国仍然是创业和投资者的热土。

有人说现在我们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实体经济，鼓励科技创新。在这种创新和投资热潮中还能产生出马云、马化腾、王传福那样的企业家吗？还会引进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吗？这个我们要从宏观政策和环境来看。

政策向来是影响创业和投资的一个敏感信号。前些年，有人说一个上市公司数千人干一年，企业的净利润还不如北上广深一套房子的价值。这个案例有点极端，但是也反映了实体经济成为一个名利场和资本脱实向虚的问题。当时的政策就强调要发展实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两会前后又强调高水平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这些都反映了中央提升中国制造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从市场看，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对中国打压、遏制、脱钩，造成了两个最大经济体一定的震荡和损害。特别是他们坚持双重标准，破坏产业链和平等竞争的原则，以至于沙利文在前些时间的讲话中说“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挖空了美国”。中国在及时应对美国挑战的同时，遵循市场原则，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在维护着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在环境上，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部门系统，都在打造营商环境，从土地、基建、税收和贷款等方面，都在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从政务、法治方面，也在健全营商环境。所以马斯克和上海签署了一个对赌协议，体现了上海更加开放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现在看，那个协议是双赢的。

以上这些宏观的政策和环境，是对所有企业的。

第二，魔鬼藏在细节处。

不同企业的成败，关键在细节。在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下，有的企业抓住机遇展示自己，利用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取得成功。有的企业花了很大的功夫，但不能如愿，这很正常。当年马云、马化腾，包括比亚迪，包括吸引特斯拉的案例，我们能看到什么成功的细节呢？马云的第一笔融资是从高盛获得，前高盛高管放弃在高盛的 500 万年薪，马云知道了就积极争取他来投资阿里，他来了以后争取了软银 2 千万美元的投资，从此马云事业开挂。腾讯呢？他们的创始人之一利用人脉关系得到了一笔融资，就是李嘉诚的儿子投了 110 万美元，腾讯的事业才得以顺利推进。百度在美国的时候就拿到了投资，李彦宏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拿到一笔融资。李彦宏当时找徐勇做合伙人，就是看中徐勇的融资能力。比亚迪是股神巴菲特在中国买的两只股票之一，另一只股票是中石油，比亚迪抓住汽油车向电动车转折的先机，处在非常有利的行业地位。巴菲特就买比亚迪的股票，结果这只股票 12 年翻了 20 番。

从这里看到什么细节呢？上述企业第一笔融资大多是通过人脉关系或熟人得到的，因为完全陌生的企业人家不可能投资，不熟悉不敢冒险投资。通过认识双方的中间人，才有这种争取投资的可能，但是不容易，很复杂，所以成功拿到资金的还是凤毛麟角。中国的投资者当时没有投资这些企业，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也不是对市场不了解

的问题，可能是认知理念或企业发展规律上的缺陷。还有一个看细节的角度，那就是巴菲特要见王传福，巴菲特见了以后说他就是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的结合体，有创新能力，又有赚钱的本领。

第三，与投资者深度沟通的秘诀。

首先要把经营企业和经营公共关系联系起来。特别是建立投资人关系，需要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言万语。认识双方的中间人，这是一个捷径，需要企业的优势，需要感性的投入，更需要坚强的意志。马云在拿到较大投资之前，遭遇了投资机构 21 次拒绝。其次，要把经营企业和经营企业团队联系起来，让管理团队更有专业性，更有创新意识，更有市场化，更有冲力，这样才能驱动它未来的发展。巴菲特说，我们非常喜欢比亚迪这个公司，喜欢他们的管理层，这就够了。企业家的素质延伸到激情，投射出的是希望和未来。第三，企业要有长远的经营战略。我们可以发挥企业其他品质去开辟和拓宽市场，但是唯有和主业相关的科技创新才可以使企业既走得宽广、又走得深远。这就需要企业把研发融入进去，把创新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腾讯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遇到了瓶颈，他们就创造了微信，使得腾讯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斯克在投资科技，也在进一步拓宽特斯拉的视野。如果马斯克目光短浅，就不可能和上海形成协议把零件全部国产化，现在已经国产化了 95%。马斯克深邃的眼光看到了中国供应链会逆转他们在产能上的不足，大幅提升他们的市场占有率，也可能马斯克眼光比我们分析

得还要远。第四，从世界维度经营企业，要经常和国际对标来找差距。我今天举的这几个企业都有世界眼光，把企业融入到世界发展当中。归纳我刚才讲的秘诀：对外搞好公共关系，对内经营好管理团队，深度上要有长远发展的战略，广度上要有世界眼光。

以上是我的一己之见，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郑培源：谢谢邵理事长绘声绘色的演讲。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叶强。

叶强：建设科大硅谷，着力吸引外资和人才

叶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非常感谢来参加这样一个讨论。主持人介绍我职位的时候，每次都比较啰嗦，要搞三个职位，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

中国科大有一个管理学院，承载着管理这个学科。2019 年，深圳市与合肥市为了促进发展，跟中科大建设了中国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目前默认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就要做这个院的院长。我们这里有 10 万平方米新建的空间，主要承载着学术研究，包括人才培养，MBA、EMBA 培养，学生创业、孵化、加速等功能，市里面每年给 1500 万经费的支持。其他收入主要是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关的收入，

和管理是深度耦合的。

在这个之后，又建设商学院。合肥建设的科大硅谷，今天上午有一场活动，科大全球校友在科大校内和网上进行了一场论坛，也是面向人工智能的论坛。组织这个论坛的部门，包括我们校友会，包括科大硅谷服务公司，面向这些校友建设了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这里面有几个设施，一个是科大硅谷有限公司，还有一个科技商学院。简单说一下我们科技商学院的投入。根据去年安徽省和中国科大签署的建设协议，安徽省给我们建设一个新的校区，在 5 月 8 号正式向公众公布了招标公告，内容是建设地上地下合计 20 万平方米，投资 20 亿面向科技型商学院的设施。从今年开始，未来每年给 2.4 个亿支持，支持 5 年，5 年之后给 2.1 亿支持，也是为建设科大硅谷和整个安徽和合肥科创生态系统服务。为人才供给提供服务。这是建设硅谷型科技创新，我们在安徽的一点实践。

怎么吸引外资？我们最近一系列活动跟科大在硅谷、在美国各地的校友互动。也有很多校友回到合肥，有一些已开始投资企业、创业，还有的人是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根据我的体会，信心对外部投资人非常重要，要让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有信心。

为了有信心，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政策，在实践中落实，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从 80 年代开始学习的，现在到了再需要进一步深化学习的阶段，我们科大商学院也承载这样一个功能。安徽合肥过去经济发

展水平比较低，近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它的高速发展跟这几届政府能够持续按照市场规律出台政策非常有关系，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大家更加聚焦于长期的政策。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地区可能更关注于短期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出台，当年就能有效果，各地可能都很愿意实施。关键是有些政策出台可能要长期才有效果，这个能不能坚持住？大家合肥和安徽怎么做得这么好？学者、企业界很感兴趣，很多地区的政府来安徽学习，也问你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做对了什么？安徽现在各方面情况都比较良好，去年 GDP 已经超过了上海总量，达到了 4.5 万亿，成为全国第十。尤其是安徽的上市公司，科创板企业数量排名第 6，在很多指标上表现出市场领域超前的特征。安徽的领导讲，这几年看到我们有这些变化，但是做对事情在更早，2007-2008 年那个时候已经做对很多事情，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后续政策也能够持续发展，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的聚集。

我今年元旦才到安徽工作，之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做院长 8 年，那时候主要在深圳和哈尔滨两地。到了合肥之后，看到它有一些不错的企业，比如阳光电源，这是在新能源领域做得非常不错的一家企业，市值过千亿了。国轩高科在电池领域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科大讯飞是一个代表性的企业。还有政府出面的风投。比亚迪把最大的厂也放到合肥。这个跟政府对科技的重视有关系，他们很早就对产业进行了布局，有些地区还在依靠房地产、依靠土地财政的时候，他们已经比较早地转到产业发展的轨道上。

我也讲讲我对 ChatGPT 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尽管大家有分歧。一些非常知名的人提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也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人认为这个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作为参与过人工智能研究的人，也想讲我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因是，目前看到的情况和最初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提出、模型应用之后，在逻辑和原理上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今天这一套跟几十年前，至少跟二三十年前差别不大，看到就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这次 ChatGPT 出来大家感受这么强烈，也就是一个工程的结果。但是我从管理经济角度看，这个量变到了一个转折点会引发质变。

在我读博士的阶段，听哈工大教授讲人工智能，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图灵测试。他讲图灵测试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状态应该属于漫不经心，无非老教授讲一个东西，是非常遥远、非常缥缈、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测试，就是把一个人或机器放在屋子里，外面的人判断不出是里面是一个人还是机器，这就说明它有智能。有人说 30%-40% 的人判断不出来，就算是人工智能。即使这样，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绝大多数同学都跟我一样觉得有生之年不会看到，还是赶快把自己的小模型搞出来好毕业。我当时做的小模型只有 1000-5000 个参数，我已经感受到很有智能了，不断训练、不断优化，能力越来越强。

现在 OpenAI 这么一个公司，包括前段时间科大讯飞，以一己之力就可以实现一个超大模型。尽管很多人提出一大

堆缺点，但这些缺点都微不足道，对于没有个性、没有情感的问题，只要加一些参数，经过训练都可以实现。关键是现在用一个支付得起的、有限的资源，已经可以实现跟人差不多的智能了，这里面有一万亿个节点，而人脑有 140 亿 -150 亿的神经元细胞。我想未来的人工智能跟人对比，除了它是我们创造的这一点之外，我没有想到其他哪些方面是它达不到的天花板，尽管现在还没有达到，但是技术上的可能性已经来了。我们希望能把握住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投资人投入实体经济提供好的环境。随着技术进步，可能我们遇到的问题，就能得到阶段性的解决。谢谢！

郑培源：谢谢！叶院长刚才提到安徽合肥中科大政府引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这也是中国式硅谷一个潜在的模式。

下面邀请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先生，他为今天的分享专门做了研究，下面欢迎黄会长！

黄峰：发挥外资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黄峰（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谢谢！就我这个专题，我看到的关键字，一个是外资，一个是科创，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一讲。

我 2019 年担任外商投资协会的会长，过去 4 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工作。我之前在上海市商务委，20 多年都是搞外资，中间断了三年。我做会长的时候，第一件关心的事情

就是外资发展聚焦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聚焦在科创上面。

外资企业在华从事研发，过去主要是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研发中心，第二种是外资协同创新，这个也比较多。在学校工作过的教授都知道，早期跨国公司有很多跟学校、跟科研院所联合开发的项目。早期是利用我们这里一些资源比较多，最近几年跨国公司跟我们的科研院所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原来是利用我们教授，利用我们人手，现在大家有一些技术上平等的合作。外商投资协会也跟上海市科委连续两年合作，我们搞上海外资协同创新案例评选，每年都要评选 10 大案例。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第三种、第四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外资开放创新平台，可以叫孵化器，可以叫加速器。

强生 JLABS @上海

2017年12月，强生亚太首家创新孵化器JLABS落户上海，为制药、医疗器材和消费品领域的早期创新者提供资本高效的孵化资源和实验室空间。

强生JLABS目前共有**74家初创公司入驻**，涵盖肿瘤学、神经科学、基因治疗、外科手术、护肤、视力和女性健康等领域，其中**48%为本土企业，52%为国际企业**。强生JLABS已助力全球首次利用AI发现新机制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团队等多个全球领先创新团队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转化。

强生JLABS引入**40家创投机构**，迄今，**创新团队共获得超过30亿美元融资或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包括一次IPO、两次收购和43次交易。

默克中国创新中心

默克中国创新中心于2018年宣布成立，并在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默克中国创新中心致力于与中国创新生态圈的合作伙伴紧密协作，搜寻、孵化和投资默克现有业务之间和之外相关领域的创新项目，尤其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的创新领域和探索方向，比如：类器官、人工智能赋能的健康解决方案、液体活检技术、清洁肉、生物电子、神经网络芯片。截至2022年5月，默克已**从上千家初创企业中搜寻和发掘了 60 多家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支持他们的业务发展。



BI-ATLATL联合创新实验室

2020年11月，勃林格殷格翰与ATLATL飞镖加速器联手创建开放创新实验室，在海内外吸引一批生物医药原创新项目孵化加速，并成功举办了两届全球创新大赛，走出了新冠生物、愈方生物等一批快速成长的全球生物医药科技企业。

拥有2400平米空间的“BI-ATLATL联合创新实验室”**共计已孵化项目60余个，吸纳来自全球的10个顶级科研项目入驻**。

礼来也将其中国创新合作中心张江加速器落户在飞镖加速器，以便快速对接本土创新药企以及科研院所，孵育源头创新，积极参与推动本土创新合作。

图 1：企业案例

图 1 是我们举的例子，上海第一家被政府认定的开放创新平台来就是强生的 JLABS，还有默克、BI—ATLATL 都

有孵化器，微软的孵化器也很牛。

这反映什么趋势？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之后，我们国家形成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创新氛围，特别是在互联网企业带动下，涌现了很多世界水平的创新企业。跨国公司也看到不能仅仅开展内部的研发，也要跟中国本土的资源和创新团队结合起来。这就是他们在中国设立孵化器、加速器的原因。

第四种情况就是企业风险投资。原来跨国公司都是投资自己的成熟产品、成熟技术，去开发中国市场，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上。现在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创新环境，就去投一些中国的创新型企业，去做少数股权的持有者，去做一个财务投资，而不是自己来投资。这对我们形成硅谷型科技创业、创新生态圈是非常有利的。以我个人角度，我比较喜欢企业风险投资，他们更懂这个行业，投的都是跟他们上下游相关的。中国轰轰烈烈发展将近 20 年，最早也是外资带来的。现在我们国家不管募资的规模，还是管理人的数量，都是非常大的。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宽松，钱非常多，所以带来这样一个热潮。但是往后看，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样一些跨国公司的投资，他们能够真正去赋能它，因为他们可以成为这些企业的用户，帮助他们进行销售，这也是未来我们应该鼓励的。

这块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投资基金还是设在境外，还是美元基金。我们要做的是，未来使更多的企业风险投资基金能够设到这里来。我最近见到一家非常大的韩国企业，

三星企业把在中国的利润投在一家基金里。在未来的地缘政治中，由于美国对我们的遏制，很多领域的跨国公司不能进行直接的大规模投资，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间接方式。在最近的高层论坛上，联合国贸发官员最后总结时说，中美将来是一种间接的互相依赖。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投资方式是更加间接的方式。

对上海来讲，未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孵化器、加速器，鼓励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管理公司、基金都设在上海，这样能够为我们建设硅谷型科技创业生态圈注入更多的非常好的外部资源。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郑培源：谢谢黄会长。他非常清晰系统的演讲使我们了解了外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上海科技创新所做的工作，他也对下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

下面邀请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贸易金融处处长孙筱和先生，有请孙处长。

孙筱和：临港新片区要成为拥有无限潜力的热土

孙筱和（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贸易金融处处长）：围绕今天的主题，也是按照乔会长要求的方向，我谈谈个人的体会。

临港新片区是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代交给上

海的三个重要任务之一，在三个重要任务基础上，国家层面把临港新片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国家战略里面，给我们赋予五个重要使命：第一，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重要基地。第二，统筹发展在岸和离岸业务重要枢纽。第三，要成为企业走出去发展的重要跳板。第四，成为更好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第五，临港新片区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一个重要试验田。

围绕今天会议主题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在我们同事支持下，跟大家做一个主题分享。

我也研究了什么叫硅谷模式，硅谷模式是把创新的能力和赚钱的本领高度融合在一起全新模式，这个模式在美国、在世界三四十年时间，已经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充分验证。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中心。中科大这几年的崛起是合肥很强驱动力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模式下，它能够迅速把科研和生产还有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实现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硅谷模式就是科技和资本高度融合，各种要素高度融合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里面，我们怎么样借助外资，甚至内外资力量实现战略性目标呢？谈几点体会：

第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现在讲高质量发展，讲均衡性发展，我们要重视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目前我们三个三角的发展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中西部地区跟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差距。基于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整个国家要做一个资源的重新统筹和平衡。合肥也可以算是中部区域，合肥的模式就是硅谷模式在中国很好的

转化，前面还有深圳模式，这些模式我们怎么样复制推广到中部和西部的城市？这些年重庆和成都是很好的案例和样本，它们就是借鉴硅谷模式先进经验，形成创新形态。这里面高水平大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庆稍微弱一些，只有重庆大学。四川成都很强，有国内双一流的电子科技大学，有川大等一系列大学，包括建设三线时的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有很强转化能力。高校都做了布局。在资源布局上，借鉴硅谷模式，我们要做到一个均衡和统筹。

聚焦到上海市，临港新片区就是上海的“西部”。在这个“西部”，希望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形成一个拥有无限潜力和有可能性的热土。我们专家也说了，要允许一定的魔鬼存在，要特别注重细节，要掌握相应的一些诀窍和机制。在新片区工作，在这个平台，特别在五个重要使命的统领下，我们就是一个希望之城和未来之城。我们着力把各种资本，在我们外资协会、金融局等各方面的支撑下，把各种资本率先导入进来。同时按周健工老师说的，最核心的还是人才，人才是真正的第一要素。

首先，临港新片区出台大量人才导入型政策，这个政策主要把人才在上海准入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了，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人才。对于海外人才，我们直接采取的是征收 15% 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这跟国际上主要自由贸易区相比也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传统的西方国家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例还是相当高的。香港和新加坡，还有阿联酋、迪拜这些地方，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极大

地降低了门槛，希望激发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变成企业家，或者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二，临港这些年推出大量的商品房土地。目前我们所在区的房价达到 10 万元一平方米，这对创业者不是非常友好。临港新片区每年提供 2 万套商品房，政府控制一手房价格，大批量供应一手房，抑制二手房的涨幅，让临港的房价长期稳定在 3 万到 4 万，首付在 80 万到 100 万就可以让他们拥有一套产权住房，这也是我们支持的方式。一旦在上海安家，就能够进入乐业和创业的下一阶段。

第三，国家规定我们是试验田，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先行先试。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们希望各路人才集聚到临港新片区，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甚至成为西部的淘金者，有冒险家精神，这样才能够不循规蹈矩，建设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的区域面积设置很有意思，临港新片区在上海占 1/7 的体量规模。设计区域面积的时候，参考和对标香港和新加坡。我们还有两条人工开挖的河，刚好成为这个区域的边界。一旦具备条件，我们想要封关运作，这两条河就是很好的物理隔绝围栏。

第四，在临港这个地区，继续发挥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要敞开胸怀，要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不管内资还是外资，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个体经济还是民营经济，我们所有政策、所有做法都是一模一样、标准化的，这个标准向国际标准看齐。要让所有人到了临港，他所面临的待遇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土壤打造好了，种子播撒下去了，

未来一定是百花齐放的。

此外，临港新片区的政府机构，我们叫管委会。我们持有的态度和理念，就是搭建平台，成就他人。就像今天一样，我们跟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跟外资企业一起，大家共同搭建好一个个专业化的平台，向纵深服务的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延伸我们政府的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让大家在临港新片区感受到家的感觉，这样大家就能够携起手来。我觉得在新片区，我们要站在深圳模式、合肥模式等创新模式的基础上，再实现临港硅谷模式，让临港成为源源不断长出科技型企业的地方。

郑培源：谢谢分享！临港在物理空间属于上海最东边，我看到他们在心态上是处于西边，是属于拓荒的状态。

今天压轴的演讲嘉宾是外经贸大学金融战略与量化中心主任曹诗男教授。

曹诗男：如何做才有利于科研创新？

曹诗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战略与量化中心主任、教授）：谢谢大家！很多点刚才大家都讲了，我补充几个大家没有提到的点。

第一，上海“十四五”规划里有做上海科创中心。刚才黄会长提到了，上海引进了很多外企研发中心。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外企研发中心来是因为在上海享受跨国公司总部政策，更多是奔着税收政策、融资政策来的，在专利转化和

专利共享上其实是不足的。我们引入目的是想向他们学习，包括以前我们引入车厂，也想中国自己造车。我们熟悉的欧莱雅研发中心也在上海，雅诗兰黛也在上海，强生、微软、西门子早都在上海了，但它们的专利没有实现共享。外资研发中心本身有融资需求。真正把外企研发中心引进来，对我们科创有一定帮助。

第二，外资愿意投中国的科创企业。但是有一个问题，上海这边 QFLP（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即股权基金的出资人）落地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上海 2010 年开始就有外商股权投资企业，最早是上海提的。过去不管在上海，包括比较火的海南，海南也是从去年开始只有两支 QFLP，天津也有，各个地方都开始，但是 QFLP 都是地区给政策，基本上区里的金融办没有审批权，得到市里审判，市里还要协调商务局，甚至市政府开会才能决定给不给。QFLP 数额就百亿，每个地方试点都在个位数，也就是一两支。外资是非常需要这个形式的，而且这是在我们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下，吸引外资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想倡议在国家层面 QFLP 有一个统一政策。另外各个市试点的 QFLP 要真正落地。这是比较直接的关于外资投资中国的问题。

我补充一个数据，我来自对外经贸大学，我们学校在改革开放初期受益于美国的各种支持。我们的国际商法很有名，因为我们原来是商务部下面的。之前我们学校的留学生非常多，占了 1/3。2020 年疫情刚刚发生时，美国在

中国的留学生是 3.7 万人，现在这个数字是 382 人，只剩下 1%。我们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制度性开放的决心大家都看到了，但要看别人接不接你的橄榄枝。现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将近 30 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最高的峰值就 1/10。在中国留学生最多来自非洲，有 1/3，来自韩国的有 1/8。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而且越来越不了解了。还有很多教育口的对外交流项目也是有阻碍的，这是一个问题，抛出来给大家

我自己在美国生活将近 10 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做的更多工作就是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是怎么想的。中国有新闻联播，美国的舆论控制也是很强的，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上海是一个最好的对外窗口，外国人以前在上海很多，以前浦东很多地方的咖啡厅、西餐厅都有老外，现在都看不见了。还是要想办法让他们来了解中国。我们 5 月份去东南亚考察一带一路，搞金融合作。马六甲海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能源通道，但是马来西亚新上任的总理已经被美国绑定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从我自身来说，我 2015 年评的副教授，2019 年评的教授。评副教授的时候，我晚了两年，当时脾气很倔的，那个时候我才 30 岁。我做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很新的课题，我拿这个课题申请，当时我很服气，按照专家之前给我的建议改了稿子。我第一次评的时候有 4 个专家，2 个专家说非常创新、非常好，一定要支持；还有两个专家很保守，说她的理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研究成果有不确定性，不一定能出研究成果。其实

这证明他们不让我们敢想，不让我们敢做，不让我们创新。大家想搞科研，大多数还是在科研院所。虽然年轻老师有想法，但是我们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之前国务院李克强总理也提出来，让老师可以三年待岗创业，大家不愿意，因为大家要先评副教授、再评教授，这样就阻碍了科研人员大胆实践，把自己作为创业要素、作为人才要素的作用。

我们人工智能大多是从百度研究院走出来，从高校出来的很少。刚才大家讨论 ChatGPT 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是学系统科学的。5 年前我在哈佛统计学院，跟清华统计中心做 GAR（通用人工智能），即是通过了解人脑底层存储识别、调取、唤醒学习的能力，做一个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而不是现在 ChatGPT。但是这个设想提了 5 年，被各种院士闭掉了，没有办法申请到任何经费，所有创投也不愿意投，觉得至少要 5 到 10 年才能有收获。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和土壤，是没有什么好的机制，没有环境给到我们。

上海有一个很好的学校，上海科技大学，如果不做金融，如果还是在做科研，我一定会去上海科技大学。他们的土壤很好，所有老师来只要看中你，就给你终身制教师，副教授、教授都可以带博士。你只需要自己跟自己比，等你的研究成果过了，你就可以升副教授，就可以申请教授。在这样好的土壤里，就可以慢慢创新。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上海科技大学去看一看，确实做得比较好。

这里就想提一点建议，美国也有自然科学基金，他们在评科创型项目的时候，认为美国国家基金是最大的风投，

评项目不看你的科研成果。在美国哪怕你的成果中期考核没有达到，只要你能证明你的工作量，能够说明你做了什么，后续可以得到钱继续你的项目。这也是我到中国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确定知道我能研究出来，如果你能确定知道研究成果，你还研究什么？如果我们将来能在人才创新上得到真正的支持，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做科研创新。谢谢大家！

郑培源：谢谢曹教授的分享，围绕我们这个主题的真问题、小细节，表面看这是一些小细节，反过来证明整个科技创新生态圈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道路是漫长，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今天的专题三，有七位专家不同方向的分享，现在到了尾声。我们分析了战略新兴产业体系建设、区域政策突破、产学研模式创新，大家讨论了 AI 在内的科技创新，外资投资案例，科技企业融资新法等，内容非常丰富。引发大家共同思考，怎么能够不断引来源头活水，怎么拔出枝头新绿。

下面我们掌声欢迎乔会长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发言。

乔依德：我提一个问题。刚才最后发言的曹教授提到，现在外资在我们这里设立研究机构是为了享受上海的优惠政策，总部在上海有优惠政策。从上海角度，为什么希望把总部的优惠政策给研究机构？也请黄峰澄清一下。曹教授你提出要专利共享，这个是什么意思？给它优惠政策，它就把专利拿出来给中国企业共享吗？

黄峰：我来澄清一下。曹教授，我坦率说不赞成你刚刚讲的观点。我是上海鼓励外资研发中心政策的起草人。2010 年我制定了上海所有鼓励外资的政策。跨国公司到中国、到上海来设立研发中心，是因为它有需求，优惠只是推动它到这里来投资。今天在座有好几位我们学会的会员，他们非常清楚了解，跨国公司不是为了你这点优惠来的。我们这点优惠根本没多少，我们给地区总部的优惠稍微多一点，大概 500 万，我们给研发中心一共就 200 多万，这跟它的投入相比是一个很少的数字。所以他们不是为了税收来投资的，首先是因为有市场，因为有需求，因为要在中国维持一个长久的竞争力，所以他们才会在中国投研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中国尽管它说这里是全球几大研发中心，但是 Development（发展）比较多，Research（研究）比较少，总体层次跟总部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第三点，专利的问题。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所有跨国公司的专利都是在总部的，如果是法国公司就一定是在法国的总部，当然可能有些会放到瑞士去。哪怕在美国设一个机构做研发，出来的专利也不在美国注册，必须是在总部注册的。所以你给它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这一点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有十几年的讨论，将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经常跟不同领导专家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我可以肯定确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税收，研究出来成果都是他们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人才，

有很多人创业，有些人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有一些是从跨国公司出来的。另外有一些人跟我讲，这样不对，因为他们剥削了我们的人，这就要看他是从哪个角度看了。

王玉荣：我们上一次在北京第 12 届研讨会，屠市长认为召开得很有效果，包括路基金的董事长做了很多探讨。从 2019 年 8 月 18 号创办以来，这是第十三届研讨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史诗般的远征。下一次，中美之间决战的战场在欧洲。还有一个战场是高科技，这个上不去不行，高科技需要有生态，需要一种模式。按我们的想法，这次就起个头。深圳是宇宙中心，实际上深圳打出来的中国式硅谷对中国很重要，现在合肥也慢慢长大了。重庆、成都也在进行，上海本来有先天优势，这次临港新片区来的先生的演讲让我都热血沸腾了。

9 月份第三个周末我们就到合肥去，那个地方是举全省之力打造的中国式科大硅谷。合肥做得非常好，像国家基金一样，政府就像一个大的风投机构，每次都看准了。10 月份我们会在香港或深圳，花两天时间，同步展开。新加坡和香港对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争夺非常激烈，新加坡已经把投资移民拔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听说那边幼儿园排队都排到三年之后了。11-12 月，我们准备跟临港新区进行合作。年底也会在北京举行一个会议。我老师在海南做省委书记，请我们去那个地方，那里也在搞自贸区，也在先行先试做。一个城市的大学是这个城市的天际线，有意思的论坛也是国家的天际线。一个地方有更多的科技型企业愿意待，那也

是天际线。

我们确实要探讨一些时代之问、未来之问，甚至科技之问。下一步对相关领域展开探讨，包括对全球上市公司对比研究。2019 年中国 12 家高科技数字化平台跟美国的 12 家相差不大，三年下来我们 12 家高科技公司加起来不及美国一家公司，我们也是从梦中惊醒。这两天听到蚂蚁集团大规模裁员，我心里痛得不行。我们机构到今天为止，非常非常艰难，希望你们把真正有意思的学者观点或专业研究者多多推荐，一个人把你当不当朋友，就看他是不是把有意思的人推荐给你，这是一个指标。

上海自贸区这个地方，坚持战略自主。别人搞了，我们要比别人搞得更加好。我们要提出很多概念，让他们来研究我们。我们要在自贸区建中国第一个智库大学，把金融领域扩展到大江南北、海内外。心要开放，世界眼光就会进来。中美这场事情，比其他学问更重要的是血性，巴顿将军说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有 3/4 是在于血性。我们希望在临港新区建立 2050 年中美金融博弈的司令部。

我就讲这些，很多时候表达真理需要艺术，我现在还差得太多。拜托大家多多关照。谢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

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和培训部部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9 期

黄峰（上海外商投资协会会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邢予青教授来给我们介绍全球价值链与世界经济这个话题。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或者企业家，这个话题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和乔依德会长 3 月份在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的时候，已经聆听了邢教授的发言。借此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邢予青教授，邢教授是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白玫瑰东亚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全球价值链。他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与培训部的部长，芬兰中央银行访问研究员，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访问经济员，芝加哥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教授。他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的学位，在美国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下面我们欢迎邢教授给我们做演讲。

邢予青（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原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 and 培训部部长)：非常感谢会长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乔依德秘书长的邀请。我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以及对全球价值链未来重构的看法。今天的题目是“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对中国的挑战”。

我想大家都在讨论供应链是否从中国转移，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在中国之外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喜欢用全球价值链这个概念，那么全球价值链和大家谈的供应链有什么区别呢？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创造一个产品全部价值的所有工序，包括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的制造、组装，批发和零售。任何一个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必须有一个主导企业来组织和运作的，而不是随机的。很多研究觉得全球价值链，就是 A 企业卖给 B 企业，B 企业卖给 C 企业，它们就成为全球价值链。这种现象 50 年、100 年之前就存在。

现在的全球价值链，是由一个组织者，比如说苹果公司进行组织和运作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些所有的工序必须是由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完成的。我看到有些文章研究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如果都在中国完成，那就不叫全球价值链。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全球价值链的链条上，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由合同契约来保证的，而不是今天我看到你的东西便宜，我就买了，明天我就不要了。苹果和所有的供应商是有合同的。立讯精密是组装苹果手机

的，歌尔股份是做 iPod 的，它们有长期的合同，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契约决定的。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是 21 世纪产品制造和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

我们过去谈一个词，叫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实际上主要是由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形成的。现在很多人说全球化已经停止了，会出现逆全球化，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全球化依然存在，还在继续，只不过过去的全球化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导，只是为了赚钱，只是想赚更多的钱，所以我们拥抱全球化。未来全球化依然会进行，但是未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多元目标的全球化。我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对其他跟经济有关系的事件，比如说政治事件，外交事件，不是漠不关心的。我觉得这些因素对于未来全球化的走势，对于未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非常重要。未来全球化是多维目标，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继续建设全球价值链或者供应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是必须强调的，而经济的效率实际上是排最后的。

在国内，大家经常讲供应链，有时候还叫产业链。其实在英语语境下，只有价值链或供应链，没有产业链这一说法。我这里就讲一下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区别。供应链实际上是经济学家讲的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对任何一个产品，可以把完成这个产品的工序分成三部分，生产之前的研究和设计，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然后是批发和零售。所以讲供应链的人，他们实际上侧重于生产过程。你可以看一下，所有谈供应链的学者或者记者，他们主要侧重于谁生产什么。所

以当大家谈苹果供应链的时候，没有人说苹果，大家说的都是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尔股份。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讲，苹果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苹果是最重要的？因为是苹果组织全球价值链，而苹果在这个链条上获得的增加值最多。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才能够看清楚是谁组织的，我们才能够理解是谁决定供应链在哪里，朝哪里转移。

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对不对？既然如此，当有些学者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担心供应链转移呢？如果都是中国的供应链，其转移对中国经济的核心影响是什么？其实供应链的定义是非常粗糙的，你可以生产手机，但是你不能生产手机芯片，不能生产操作系统，对不？所以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生产鞋，耐克在中国有 100 多家制造商，但是我们不能生产耐克鞋，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不能生产耐克鞋，你就卖不了几百块一双，同意吧？你可以打造自己的品牌，比如说李宁，我曾经看到李宁在新加坡开过店，现在已经倒闭了。我们能做牛仔裤，但是谁让你做的？这个产品本身的知识产权属于谁？这时候你要了解主导组织和中国企业产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有最全的产业链，但是我们却很担心如果沃尔玛不给我们发单，如果耐克不让我们做鞋，我们就会遇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到海外抢单的原因。所以只有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产品全部价值的制造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一个国家创造了价值，最终获得了多少价值。对于经济学家，我们谈 GDP，谈经济增长，就是收入，

这很重要。引用苹果 CEO 的一句话，“我们做制造业的方式是，我们关注所有国家，看看每个国家的居民都有什么技能，然后选择最好的。”是苹果在考察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有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能力，然后苹果就选谁，这就构成了苹果产品的全球价值链。

Components	Manufacturers	Cost
CPU: A11 Bionic	Apple, TSMC	\$26
NAND flash memory: 256 GB	Toshiba	\$45
DRAM 64 GB	Samsung	\$24
PCB	M-Flex (China)	\$15
Others	QCOM, Broadcom, AMS etc.	\$34.75
5.8" OLED	Samsung	\$80
Camera Module	STM, Largan Precision, Crystal Optech (Filter), etc.	\$33
Stainless Frame	Kersen Technology	\$35
Battery	Sunwoda	\$9
Glass cover	Lens Technology	\$18
3D sensing Module	STM, Largan Precision, Crystal Optech (Filter), etc.	\$25
Others	Broadcom, Nissha Japan, Anjie, AAC etc	\$54
Wireless charger	Broadcom, Luxshare Precision (Coil module)	\$6
Assembly	Foxconn	\$4.5
Grant Total		\$409.25

Source: Y. Xing and S. Huang (2021), "Value captured by China in the smartphone GVC: a tale of three smartphone handsets,"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8(C): 256-266

图 1：iPhone X 的全球价值链

图 1 是我做的 iPhone X 的拆解，我可以自豪的跟大家讲，所有关于苹果手机的分拆研究，关于中国对苹果手机增值的贡献都是我做的。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懂技术，但是我做这个研究，通过分拆可以知道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构成。大家都知道苹果是主导企业，负责产品的设计，负责软件，负责销售，实际上就是微笑曲线最高端的地方。这一款手机刚上市的零售价是 1000 美元，苹果从这 1000 美元获得多少呢？590 美元，非常多吧？然后你再看其他的供应商，

比如它的闪存是由东芝提供的，价格是 45 美元，再看一下三星提供的 OLED 屏幕是 80 美元，是最贵的。中国的企业里，欣旺达提供的电池是 9 美元，富士康负责组装是 4.5 美元。所以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谁在干什么，谁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拆解是深圳的一个手机设计公司的工程师帮我做的。苹果每出一款新手机，首先购买的是其他手机设计公司，他们买来以后就拆开，看这个手机用的是什么零部件，新功能是怎么产生的，也造一个一样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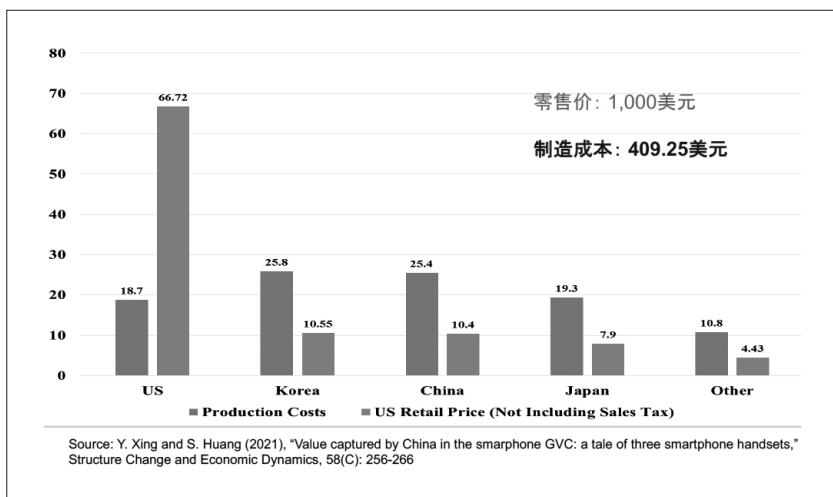


图 2：iPhone X 增加值的分布

根据刚才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按国家排列的增加值（图 2）。如果以生产成本来计算的话，美国获得的增加值是 18.7%，韩国获得 25.8%，中国获得了 25.4%。我拆解第一代的时候，中国获得的制造业增加值是 3.6%。现在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替苹果打工了这么多年，是否有技术进步，是否获得了更多的增加值？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近很有名的一个杂志上有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不能阻挡中国的技术进步，文章开头用的例证就是我对 iPhone 的研究，但是他没有提我的名字，我认为这涉嫌剽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只要加入了全球价值链，尽管它不做研发，也能够通过主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营销获益。所有链上的中国企业可以和苹果一起进步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投资股票时，一听说 A 公司下季度要给苹果供货，你肯定要买，因为它的股票马上就涨上去了。歌尔股份前一段的股票从 30 多块钱一下子掉到 10 几块，为什么？因为苹果砍单。这是苹果作为一个主导企业对它们的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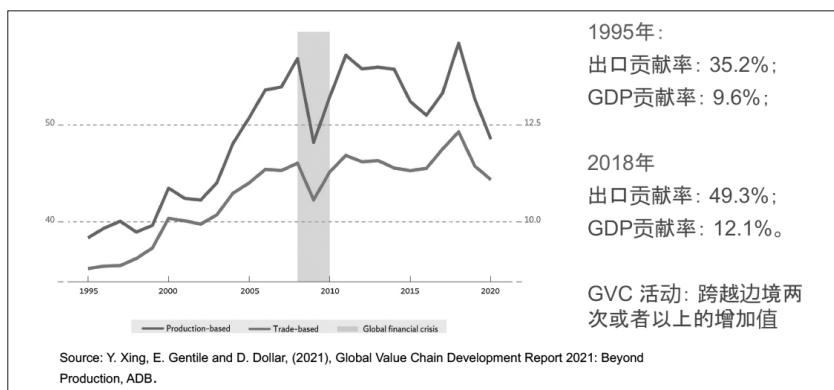


图 3：全球价值链对世界出口和 GDP 的贡献

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要考虑，全球价值链对整个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贡献？经过测算我们会发现（图 3），在 1995

年的时候，全世界出口的 35.2% 来自于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全世界 GDP 的 9.6% 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到了 2018 年，近一半的出口都是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的，对 GDP 的贡献达到了 12.1%，这两个曲线在 2008 年以后两次下滑，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是 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病毒等，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运作产生了冲击。这其实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比较狭隘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活动是必须跨过边界两次的产品的增加值，这个定义其实忽略了许多全球价值链的活动。比如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在中国当地卖，实际是越过边界一次，这是不是全球价值链的活动？肯定是。比如特斯拉的车，绝对是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还比如说，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运到了越南，运到了日本，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如果把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加进去，在 2016 年它对于整个世界 GDP 的贡献是 20%。就是说，全球价值链在推动国际贸易以及世界经济的增长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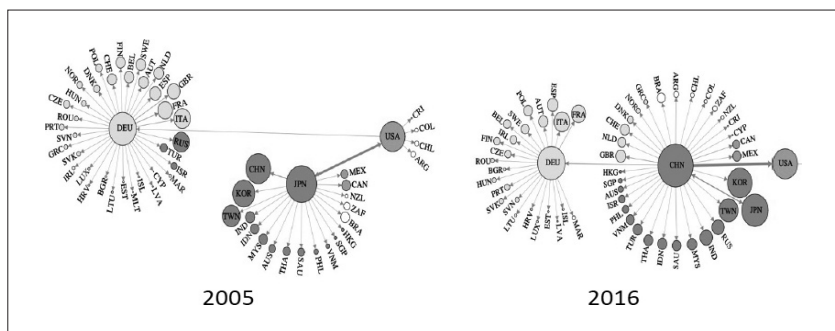


图 4：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演变：2005—2016

图 4 就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图。我们做经济学研究有时候需要把它做得科学，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网络图。点的大小代表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 2015 年时中国比日本还小，但是到了 2016 年中国是最大的。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实际上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的。这个图的来源报告已经翻译成中文，是我主编的，叫《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超越制造》，英文版是在 2021 年 11 月份发布的，中文版是今年刚发布的，可以在网上买到。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依赖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对整个世界财富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是过去 20 多年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最大获益国，美国都没有中国获益多。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什么呢？第一，获得了收入；第二，获得了就业。美国当然也获得了收入，但是美国没有获得就业，这是事实。中国的出口奇迹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这就是我要向大家推销的理论，我这次来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各个高校推销我的理论。中国很多经济学家都说，现存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中国过去 40 年发展的奇迹以及快速增长。你们可能很熟悉这种论调。我作为经济学家只同意这个说法的一部分，我认为现存的经济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成功之谜，需要中国经济学家或者外国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实际上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我出版的一本书叫《中国出口之谜》，这本书的英文版 2021 年由新加坡的

科学出版社出版，去年三联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我的主要论点就是：过去 30 多年，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中国的出口奇迹。

我想没有人否认过去 30 年中国的出口奇迹，这里我展示一个事实：中国是全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而中国成为第一大国的时间是 2007 年。今年是 2023 年，2007 年是 16 年前，大家想想 16 年前上海是什么样，中国经济是什么样？16 年前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2700 美元，那时候是很穷的。但是我这里谈的不是衣服、鞋、玩具，我谈的是高科技产品。2007 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有 3426 亿，世界银行有这个统计。美国号称世界头号高科技国家，出口 2445 亿，日本和德国更低。到 2017 年中国一枝独秀，出口 6542 亿，美国变成 1569 亿。当你看到这个统计数据时，你会觉得很震撼，对不对？我们从 1980 年开始改革开放，1980 年之前中国是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但是不到 30 年，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的高科技出口国，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人类历史、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这件事。不光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很多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说著名的哈佛教授丹尼罗德拉克，他在 2004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比例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那就说明发展中国家能达到那种水平，这说明

什么呢？第一是中国的研发投入，第二是中国的工业政策、科技政策特别有效。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中国能在 2007 年成为第一，我感到很自豪，我也认为中国的科技政策和 RND 投入是有效的。但是我不认为，在 2007 年中国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投入能让中国成为全世界高科技出口第一国。所以我开始用全球价值链的观点研究中国之谜。

-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布匹换葡萄酒；
- Heckscher-Ohlin theory 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衣服换汽车；
- Paul Krugman 以规模优势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Toyota for BMW（产业内贸易）。
- Melitz 企业异质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大，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国际市场，因为国际贸易需要固定投入（了解市场，建设销售网络，做广告等等）
- 这些理论的隐含假设：（1）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的；（2）一个产品的全部工序（研发，设计，品牌，零部件制造，组装，批发，零售）由一个企业完成。

这些假设在价值链贸易时代是不成立的！

图 5：主流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出口奇迹

传统上，我们有四大贸易理论来解释出口（图 5）。从理论上来讲，国际贸易理论其实是很简单的，李嘉图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这两个比较优势主要解释产业之间的贸易。后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规模优势，因为他发现，日本人能造车而且造的很好，但是日本人还进口 BMW，为什么呢？规模效益是一个问题。后来 Melitz 在 2003 年发表了一个论文，他解释为什么有规模效益，规模效应由投资决定，所以出口企业需要投资很多，做品牌，做销售网络。因此他的结论是，只有大企

业才能出口。还有很多学者发表了很多文章，说就是这么回事。这些理论隐含着下面的假设，第一，一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完全由该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绝对是这样的；第二，一个产品的全部制造程序都是在一个企业完成的，或者至少由在一个国家内的企业完成的。这些假设完全不对。比如我面前的这个联想电脑，这个电脑跑得快是由它的 CPU 决定的，这个电脑能够运作得很好是由它的操作系统决定的，CPU 和操作系统都不是中国的。比如我们喜欢的 iPhone，那么贵的手机你为什么喜欢它？不是因为它是富士康组装的，我们才买的。苹果赚取了手机 80% 的利润，为什么呢？因为苹果自身的技术和唯美的设计。所以以前的那些假设都不对，用来解释中国出口奇迹肯定是不对的。



图 6：全球价值链：Made in China 进入海外市场的主要载体

那么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图 6）。如果你用苹果手机，你会看

到 DESIGNED BY APPLE ASSEMBLED IN CHINA，我是第一个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个，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甚至消费者都没有注意到。这告诉你什么呢？中国从事的任务就是组装，苹果是设计，由哪里造的呢？不知道。如果我们再看 GAP，H&M，优衣库，都是中国制造的，并且往往是一家工厂给这三个品牌做。很多人强调比较优势，那么你想，这三个品牌的产品都是一个企业做的，其比较优势和成本是一个常量，产品在市场上怎么竞争？就是它的设计、品牌销售网络。沃尔玛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厉害？因为它在美国有 4500 家店，有 500 个山姆会员店。换句话说，这些产品本身竞争力，实际上是来自技术、品牌、设计以及销售网络的竞争力，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关系。所以用比较优势来解释是不对的。

价值链的主导企业是利用自己拥有的品牌、技术以及销售网络，来组织和运作价值链的。主导企业的这些无形资产，对于参与价值链的企业可以产生下列溢出效应：

1. 品牌的溢出效应（例如，Nike）
2. 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的溢出效应（例如，iPhone 发明给美国康宁公司 1960s 发明的大猩猩玻璃创造了市场；iPod 的发明让东芝的“无用”小硬盘成为了先“现金牛”）
3. 全球批发/销售网络的溢出效应（沃尔玛带动中国 5 万家供应商，每个供应商的平均口额：100 万美元）

这三大溢出效应，让价值链上非主导企业，克服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的壁垒，顺利进入国际市场，享受国际市场的规模红利，并与主导企业一起成长。

图 7：全球价值链的三大溢出效应

那么为什么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够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第

一高科技出口国，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呢？每一个跨国公司用自己的品牌、技术以及销售网络来组织全球价值链。比如优衣库，优衣库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销售网络，当优衣库让中国一个工厂给它生产牛仔裤时，牛仔裤可以销售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优衣库的店，生产的工厂就不用担心能不能卖出去，卖到哪里去，也不用想这个牛仔裤的式样是否流行，消费者是否喜欢，这都由优衣库来做。因此非主导企业可以获得下面的溢出效应：你可以享受好处，但是你别投资，你也不用努力。这就是品牌溢出效应。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给耐克生产鞋的企业，你问它能不能做鞋？它肯定能做鞋，但是它做不了耐克鞋。对一个企业来说，需要选择做自己品牌的鞋，还是做耐克品牌的鞋。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当耐克不停做广告，不停在全世界推广耐克鞋，让耐克鞋变得越来越流行，喜欢耐克鞋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这种对于耐克鞋的喜爱就转换成对中国生产耐克鞋的工厂的需求，是这样的一个传递效应。

其次是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的溢出效应。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我们使用或者我们见到、知道的所有高科技产品，都是由跨国公司发展的。但是中国却是全世界出口第一国，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高科技产品，比如我面前的笔记本电脑，或者你们使用的手机，不仅仅需要先进的 CPU，不仅仅需要操作系统，也需要标准的零部件，比如我刚才讲的 iPhone X 的电池。我们中国的企业可以做什么？可以提供标准的零部件。手机有几个千个零部件，需要人把它组装在

一起。不要相信机器人，我参观过手机厂，组装零件的都是工人，为什么？手机零部件有一两千个，特别小，没有机器人的手能有人手灵巧。中国的企业可以提供标准的零部件，提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苹果刚推出手机的时候，一年销售只有两千万台，现在苹果一年卖两亿台。这样，一开始中国可以组装两千万台，当苹果销售两亿台的时候，我们就组装两亿台。苹果的技术进步带动需求，实际上通过全球价值链带动对中国企业生产零部件的需求，带动了对中国劳动力加工的需求。

这里有两个例子，时间关系我们就讲一个。现在所有的手机屏，用的那个玻璃叫大猩猩玻璃，你们是否知道这是由哪个公司发明的？康宁。什么时候发明的？上世纪 60 年代。康宁公司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发明了大猩猩玻璃，但是康宁公司不知道这个玻璃有什么用处，所以一直没有用。等到苹果公司准备推出智能手机的时候，一开始的计划是用塑料的。乔布斯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说必须用玻璃，但是玻璃易碎，那就必须用非常坚硬的玻璃，而且这个玻璃要能够防划，因为手机装在口袋里面，车钥匙、门钥匙会划到手机。所以这个玻璃第一不易碎，第二不能划坏。那么这个玻璃从哪里找呢？乔布斯的朋友告诉他，康宁公司有，所以就找到了康宁公司。对方说：我们是有这个技术，但是不生产，也没有用。乔布斯说，你就生产，我都用，于是立刻投资了康宁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没有用的发明，现在变成康宁公司最大的创造的利润点。因为苹果，现在全世界大

概 60 多亿各式各样的手机、平板电脑，都用这个大猩猩玻璃，这就是一种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因为谁产生的？是苹果的技术革新。我不知道大家的果手机是不是都贴膜？其实不用贴膜，我永远都不贴膜，我希望你们不用贴膜。第一，需要另外花钱，第二，贴膜以后就不能享受大猩猩玻璃给你们带来的美感。你把钥匙放在里面都没有问题，不会有划痕的。

第三个就是销售网络。沃尔玛在中国有 5 万个供应商，很多都是小供应商，这些小供应商的产品为什么能卖到美国的千家万户，甚至全世界呢？因为它是沃尔玛的供应商。

所以这三大溢出效应，让价值链上的非主导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克服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品牌和网络销售的壁垒，使得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设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是做企业的，想把商品卖到日本、卖到美国，谁来买我的东西，我能在哪一个店里去销售，是不是很头疼？这个设计他们喜欢不喜欢？但是如果你作为耐克、H&M 或者优衣库的加工商，你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告诉你怎么做，做什么样子，他们负责销售。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企业家加入价值链以后，就能享受这些溢出效应，能够和主导企业一起生产。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我需要给大家举例一些事实，我们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证明自己的逻辑和理论的。

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对美国 iPhone 的出口。iPhone 在 2007 年上市，2009 年中国对美国 iPhone 出口是多少呢？

20 亿美元。2015 年是 75 亿美元，这表示什么？在六年间增长了三倍之多，那么在这六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名义工资增长超过了 100%，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10%。如果我们强调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上我们的比较优势变得越来越不好，对不对？苹果手机本身越来越贵了，一开始是一台 500 美元，到 2015 年是 650 美元，所以它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没什么关系。因此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对美国苹果手机出口三倍的增长？肯定是因为苹果公司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这就是一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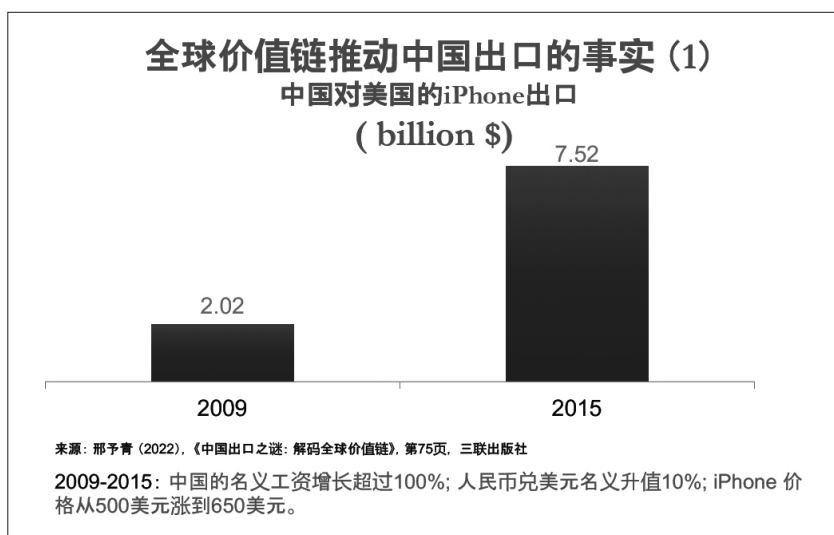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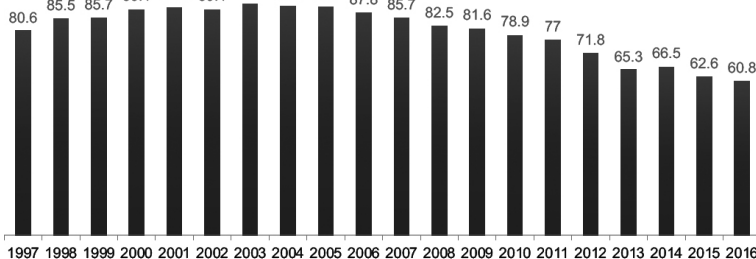
图 8：中国对美国 iPhone 出口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我当时做研究时，去探究这些高科技产品是如何生产的。大家知道中国有一种贸易形态叫加工贸易，就是把外国的零部件进口以后组装成

成品，然后出口。我们高科技产品在 1997 年 80% 是加工贸易，到 2003 年是 91.2%，意味着每 100 块钱的高科技出口 91.2% 是属于把零部件拿来以后出口。中国高科技出口实际上就是全球价值链贸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高科技出口变成全世界第一，并且增长这么快，这不是一个苹果手机，这是一大类产品。

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出口的事实 (2): 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

加工出口占高科技出口的比例



来源：邢予青 (2022)，《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第81页，三联出版社

加工出口：典型的价值链贸易

图 9：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

现在中国高科技出口产品占中国出口三分之一。这是我做的一些测算，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对于我们很重要，为什么要出口？因为希望获得收入。但是如果出口 100 美元里，自己创造的增加值只有 30 多块，那 60 多块跟你没有关系。中国加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是很低的，2004 年只有 30%，到 2018 年谁 37.6%。所以这这也是一个论据，

来证明我们加工出口，实际上是价值链贸易。那么中国整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是多少呢？2004 年是 54.5%，2018 年是 63.7%。

我把我的计算和 OECD 进行了比较。如果你是做学术的，你会对这个结果很有兴趣。我们经常讲学术话语权，OECD 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现在大家都用这个数据库。我本人认为，这个数据库就是看起来很科学，投入产出表很复杂。我是学数学的，所以我知道做模型的时候，你可以做各种假设。OECD 在估算时的假设是错误的。比如它认为同一类产品，无论是普通出口还是内销，使用外国零部件的比例是一样的，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它的结果。它的数据显示在 2018 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是 82.8%。我自己算了一套，我觉得我的结果比它好的多，很多人喜欢我这个结果，一位哈佛很著名的教授就引用了我的结果。

全球价值链这么好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现在走到了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它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第一就是中美贸易战。全球价值链的策略，实际上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或者关税壁垒很低的环境，因为你的零部件要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有时候这些零部件要跨越国境好几次，如果关税很高，或者进出海关的手续很复杂，那么交易成本就很高。但是美国现在就是说，我要对你征 25% 的关税，这样一下子就破坏了原来非常友好的环境，这就导致价值链要进行重组。

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风险

- 持续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25%，按中国的增加值计算，税率可高达100%）
- 中美之间的技术脱钩（目前，超过600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美国也禁止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出口中国）
- 新冠疫情暴露的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1. 基本医药品的短缺；2. 域疫情防护引起的全球供应链中断。
- 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图 10：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包括我们认为最伟大的华为企业，也需要美国的技术。现在大家知道，华为离了美国的技术还是不行，2019 年时全球市场份额第一是三星，第二就是华为，华为在全世界市场的份额是 19%，但是 2021 年第一季度华为的份额只有 4%，现在在海外市场看不到华为。为什么？因为手机使用的操作系统安卓，后来华为发明了自己的麒麟芯片，但是华为是设计，制造需要台积电，美国表示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不能给华为生产，这就导致华为手机产业的衰退。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发展了自己，利用美国的现有技术，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美国从贸易战以后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实体清单，只要进了实体清单，就几乎不太可能获得美国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的企业要重新思考。这就是价值链重构的动力。

所以我们现在讲内循环，国家大力鼓励企业在核心技术要有突破，跟这个都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冠疫情。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我们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实际上是对企业的运作产生了冲击。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工序座落在不同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出现问题时，无论这个工序是核心或非核心的，都会使得在其他的地方的上下游企业全部停工停产。所以可以看到日本的汽车厂停工停产。印度很着急，因为 70% 的药原料来自中国。

还有就是地缘政治对全球价值链运作的冲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19 年日本突然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材料进行管制，因为日本企业控制这三种半导体材料的 70%-90% 的市场。日本把韩国从友好国家名单里剔除，因为日本对韩国在劳工问题上的做法不满，所以韩国和日本开展了贸易战。最近两国和好，日本又把韩国放进了友好名单。这就是地缘政治导致的全球价值链的中断。

还有就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件，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最近在 2023 年 4 月 27 日布鲁金斯会议上，他说：“我们和中国的竞争在多方面进行的……我们应该实施一个量体裁衣的限制，在这些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不仅如此，我们要和我们核心的盟国和伙伴一起，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对中国实行技术的禁运。”意思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即使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也无所谓，这也是美

国财长耶伦的意思。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到这样有经济损失，认为是必须要支付的成本。比如每个国家都有石油储备，把那么多石油放在那里不用；每个国家都有粮食储备，粮食放在那里也是有成本的，其实都是为了国家安全。

中美贸易战演化到技术脱钩，实际上也导致两国的供应链或者全球价值链要进行切割，或者重构。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方向

目标：

- 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抵御自然灾害，流行疾病，以及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
- 加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基本医药产品，基础设施（例如通讯设施）和重点产业的安全（例如，半导体制造）

韧性和安全性是主导未来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因素

策略

- 在岸 (onshore)/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
- 分散化 (China +1)
- 区域化 (in China for China)

图 11：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方向

半导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我下面要对这个进行具体的讲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方向是什么呢？叫韧性，这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这种韧性就要使价值链能够抵御自然灾害、流行疾病以及地缘政治危机。另外就是国家安全，即使没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为保证国家安全也要控制。所以在一些核心的产出方面，比如讲的药原料，中国是全世界药原料最大的生产国家，全世界药原料出口 40% 来自中

国，美国抗生素的 90% 来自于中国。所以一旦出现危机的话，美国可能就出现药的短缺。我在里面讲的很清楚，保护国民的医药健康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还有基础设施，还有其他重点安全，就是半导体。所以我认为，韧性和安全性是主导未来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策略因素，而非经济效益。

这些策略有所谓在岸和友岸。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这些生产药原料的企业回到自己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政府就鼓励在日本开设生产药原料的工厂，日本政府补贴一半。还有友岸外包，如果只是回到自己国家可能做不到。为什么日美要联手重新打造半导体价值链？因为美国一家无法重新构造半导体价值链，这个时候就需要友岸外包，和有共同想法的国家一起来做。我们做经济学研究要给出量化的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如果存在一些核心的部件或产品，或者专业，过度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被认为有脆弱性。举个例子，10 纳米以下的半导体技术，92% 在台湾，8% 在韩国，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日本看来，就是脆弱性，一旦台湾海峡出现问题，怎么办？

中国每年出口手机 10 亿台，这就是中国是世界工厂的例证。现在他们就想，最好在中国是有运作，但就是为了中国市场，而不是往美国出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关税。下面我主要跟大家讲关税。很多人认为关税影响不是很大，甚至认为，关税让美国企业承担好了。我可以跟大家讲，关税的影响特别大，关税是导致现在以中国为组装加工基地的

供应链转移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海关征税的运作方式。我前面讲了，中国出口的产品本身包含了非常多的外国零部件，中国贡献的增值值只是部分。但在美国收税时，是按照贸易的全部价值收税，比如 iPhone X，就是 25%，这个就很要命了。比如中国向美国出口一个东西，是 100 美元，其中中国只贡献了 10 块钱，那 90 块钱都是日本、韩国过来的零部件，那么美国收 25% 的关税时候，这 25% 的关税，远远大于在中国创造的 10 块钱增加值， $10 \div 25$ 是 250%。经济学有个概念叫有效关税保护率，它的实际保护率不是 25%，是 250%。对于跨国企业来讲，要思考把东西都运到中国，然后组装成品运到美国，就得交那么多税，肯定是不合算的。中国的生产优势完全被抵消掉了，这跟美国人交税，还是中国人交税，是没有关系的，它使得这种运作完全是亏损的。因此，以美国为市场以中国为加工组装基地的供应链，必须得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也走了，因为苹果公司表示，歌尔股份得去越南生产，不然 iPhone 要交过高的关税，所以歌尔股份就走了。如果 iPhone X 要征收 25% 的关税，按照中国贡献的增加值是 26 元的关税，但是如果按照毛值就 102 元。我经常讲，美国人其实也认识到了关税在这上面的有效性，所以美国人迟迟不愿意撤销关税，他们希望这种供应链的重组不要过度集中在中国。

重构全球价值链不是纸上谈兵，其实都开始这么做了。去年美国通过了芯片法案，大家都在谈论。其实在此

之前，2021 年美国就公布了一个文件，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在那个文件里美国提出政府出资 2500 亿来重振四大产业，所以它有是目标的。四大产业第一是半导体；第二是大容量电池，主要用于 EV（电动汽车）；然后是重要原材料，比如说稀土；以及药物原料。美国去年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其实它的目标是 EV 产业链，就是电动车。所以希望大家做电动车行业或投资电动车时，不要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崛起太过于乐观了。因为电动车是汽车的未来，汽车这个行业对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来讲，都是支柱企业。电动车的核心技术是电池，对于这个核心产业，或者我们叫支柱产业来讲，日本的 EV 都靠中国的电池，美国的 EV 都靠中国的电池，这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尽管你的电池现在很厉害，但是日本和美国都要造自己的电池。这个法案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电动车想要在美国获得 7500 美元的抵税，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电动车必须在美国组装，如果在中国组装卖到美国就不行。第二，电池的关键材料必须在美国或在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 FTA 国家，目前是 40%，大概到 2026 年必须是 100%。这两个规定，实际上就是美国希望重新打造一个电动汽车的产业链。

美国这么做，日本就很不高兴，因为日本松下是特斯拉的主要电池供应商，特别是它的高档系列的供应商。松下电池都在日本生产。有件事情我看到国内没有报道，我特别惊讶，也许你们可能觉得不重要，但这里面牵扯到国际关系，现在完全变了。日美之间没有自贸协定，但是美国商务部在

今年4月授予了日本“FTA国家”身份，我给你这个资格，就解决了电池核心材料的问题。所以在日本造的电池可以继续卖到美国。

美国政府复兴制造业和重构供应链的政策

- 美国计划投资2500亿美元打造有韧性的供应链，目标产业：半导体制造，大容量电池，重要原材料，以及药原料。
- 《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2022），影响以美国为市场的EV产业链。满足下列两个条件，可以获得7,500美元的抵税额：（1）在美国组装的电动车；（2）电池关键材料在美国或者与美国有FTA协议国家制造7500。美国商务部2023年4月授予日本“FTA国家”身份（frienshoring, 友岸外包的策略）
- 美国半导体和科学法案(CHIPS, 2022), 提供527亿美元支持半导体制造业；
- 用补贴杠杆撬动投资，保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性。

图 12：美国政府复兴制造业和重构供应链的政策

日本政府对促进产业链多元化和韧性的支持

- 日本经济产业省：2020-2021 批准了418个回流项目，补贴 5500亿日元；
- 日本贸促会：2020-2021 批准了103个朝东南亚转移的，每个项目最高补贴50亿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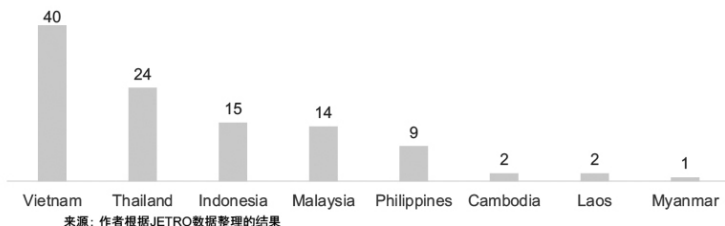


图 13：日本对促进产业链多元化和韧性的支持

美国人让日本加入半导体联盟，这样日本有损失，这个损失如何补偿？这件事还在谈。关于半导体，美国有巨额的补贴，补贴方法不是把钱都给你，按照美国的算法大概四分之一，即如果有 100 亿投资，你拿 75 亿，我补贴 25 亿，你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我才给你补贴。

日本也在做。2020 年到 2021 年，经济产业省批准了 418 个回流项目，总共补贴 5550 亿。日本贸促会批准了 103 个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补贴 50 亿，这是朝东南亚分布的项目，越南第一，这就是越南很火的原因。

企业重构供应链的行动

- 三星已经在2019年将手机组装全部从中国搬到越南，越南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手机出口国
- 三星计划在日本投资2.2亿美元设立研发中心；
- TSMC在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开始投资晶圆制造；
- 苹果已经将AirPods组装从中国搬往越南，开始在印度组装iPhone 14;2025年，25%的苹果产品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制造（摩根大通预测）

图 14：企业重构供应链的行动

不仅仅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背后支持价值链或产业链重构，企业也在进行行动。比如三星 2019 年把在贵州的最后一个制造厂搬出了中国。现在越南是全世界第二大手机出口国，越南的人均 GDP 只有 2000 美元，但它是全世界手机

出口第一大国，不是逆天了吗？就是因为三星。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讲这个故事，有一个非洲来的学生说：邢教授，我现在才明白，我的手机为什么是越南制造的，我当初买了三星，看后面是越南制造，就说这是伪造的，韩国手机怎么能在越南造呢？对方说就是在越南组装的。

三星在日本投资 2.2 亿美元建立研发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和韩国一直不太对付，三星被日本人认为是打败索尼的一个企业，可以说是一个死敌。两个国家关系不好，日本人不买韩国的东西，所以在日本看不到韩国汽车，日本人也不用三星的手机。在美国很多人用三星手机。三星现在去了日本，投资两个亿设立一个研发中心。苹果从中国部分搬到越南，并且在印度开始组装，2025 年 25% 的苹果产品要在中国之外进行生产，这是乐观的估计。

中国企业也在转移

- 2019年1-6月，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了61亿美元；（2001-2018的18年，中国在越南的总投资是97亿美元）。
- 前7大投资项目，5个来自中国：这包括
 - （1）歌尔股份 2.6亿美元
 - （2）赛轮集团2.8亿美元；
 - （3）贵州轮胎 2.1亿美元；

中国产的AirPods 和轮胎都要分别被征收15% 和25%关税

供应链重构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动力

图 15：中国企业也在向外转移

中国企业其实也在转移，看到这个数据，我特别惊讶：2019年1到6月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61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巨大的。2001年到2018年，这18年中国在越南投资才投了97亿，而这6个月就投了61亿。越南统计了，前七个大项目中五个来自中国，歌尔股份2.6亿，赛轮集团2.8亿，贵州轮胎2.1亿。轮胎要被征税25%，中国企业也在想办法避开关税，所以关税的影响非常大。

日美合作重构半导体供应链

- 2023年5月18日，日本首相岸田在东京接见世界半导体7大巨头CEO：Intel, IBM, TSMC, Samsung, Micro Technology, Applied Materials and IMEC.
- 2023年5月27日，日美发表关于加强半导体研究与产业发展合作的声明
- 美国的优势：半导体设计
- 日本的优势：半导体制造，相对丰富的技术和工程师储备，日元贬值导致的土地和人工价格的低廉，丰富的水资源。
-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日本是可以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与美国一起重构半导体供应链最佳伙伴。

图 16：日美合作重构半导体供应链

下面我就讲半导体，大家是否关注日本的股市？日本的股市，在过去三个月天天涨，都不往下跌了。有人说是因为日本股市比美国股市的价格低。我就说，26000点的时候更便宜，怎么不见资金去呢？是在G7开会的前后，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日本成为了美国在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最有利的帮手、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把地图拿出来一看，欧

洲在打仗，台湾比较危险，韩国也比较危险，北朝鲜三天两头测试飞弹。只有日本是安全的。日本在上世纪 80 年代是全世界半导体第一的国家，日本的半导体市场曾经是 70%，把美国赶出了日本，让英特尔退出了存储芯片。所以美国开始和日本打贸易战，强迫日本签署了半导体协定，让日本人保证日本国内 20% 的市场是美国的。所以这叫风水轮流转，变成了现在这种状况。

2023 年 5 月 18 日，日本首相岸田在东京接见了半导体七大巨头，谁都不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财经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你回忆一下，什么时候轮到日本首相接见他们？如果是美国川普总统，这些人一起来见还行。这些人一起会面过日本的首相，根本不可能嘛。但是他们在 G7 开会之前都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5 月 27 号，日美发表关于半导体的官方联合声明，加强两个国家在半导体方面研究和制造的合作，其实他们的企业已经开始做了。美国有什么优势呢？美国的优势是设计。日本有什么优势呢？是制造。媒体上说，在美国的施工很慢，美国的工人不愿意加班，也不愿意周末工作，工作也不认真。但是日本人加班没有问题，对不对？日本人做东西很认真，单晶硅提纯到 99.99%，都是日本人干的，所以日本不缺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而且现在日元贬值，美国说没说日本操纵汇率？如果是川普执政，会说你又操作汇率，小心我收拾你。现在美国说过一句话没有？这就是变化，美国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呢？美国觉得挺好，贬值以后，日本的土地、劳动力

很便宜。我儿子在雄本国立大学医学院读书，我去过那个地方，很漂亮，人不多，土地很多，地下水特别丰富。半导体制造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日本可以保证半导体供应链，和美国一起重构供应链。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日本成了一个热点。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突然在日本投资，而投资的是五大商社，他估计已经拥有超过 7.25% 了。上次 4 月份他访问的时候，他说拥有商社的 7.25%，要长期投资，目标是拥有 9.9%。他说，如果我拥有 10% 以上，我一定要跟你们谈话。他离开日本以后，三菱商社宣布回购股票 3000 亿，这是日本历史上，上市企业回购股票最多的。估计是巴菲特跟他讲，我喜欢的股票是估值比较低，你要是回购我更喜欢。3000 亿是流通股的 6%，回购以后干什么？销掉，这样股东的估值不就更提高了吗。巴菲特是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干这个事的，2020 年 4 月份公布的。他入市的时候，三菱是 2000 日元一股，今天的收市价是 6800，2000 到 6800 是多少？三倍多。你说这个老头，92 岁，轻轻这么一干，三菱商社不是高科技，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商社，股价可能比美国科技股涨得还厉害。巴菲特投资日本股市，带动了其他美国资金进入日本。现在日本股市为什么天天涨？因为外国资金害怕误了这班车。我来之前，在东京外国人记者俱乐部参加了一个会，有三个 **Speaker** 都是来自投行的，异口同声地说日本股市要上去，讲了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日本和美国一起联合打造这个价值链最强

力的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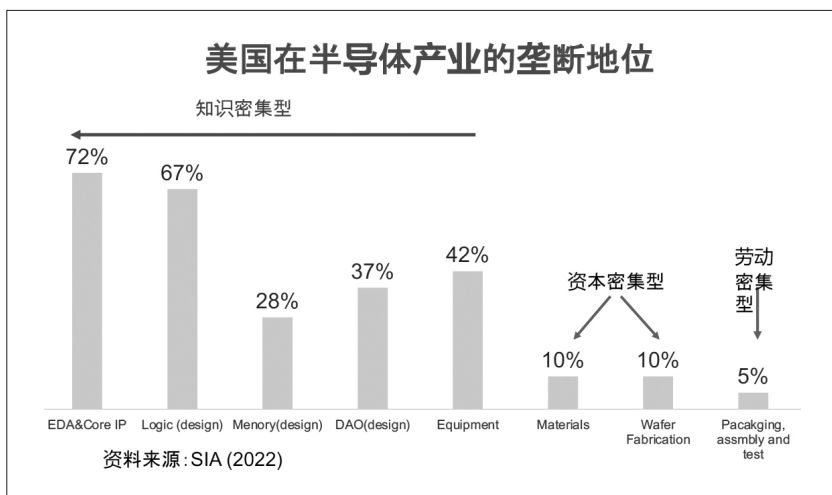


图 17：美国在半导体业的垄断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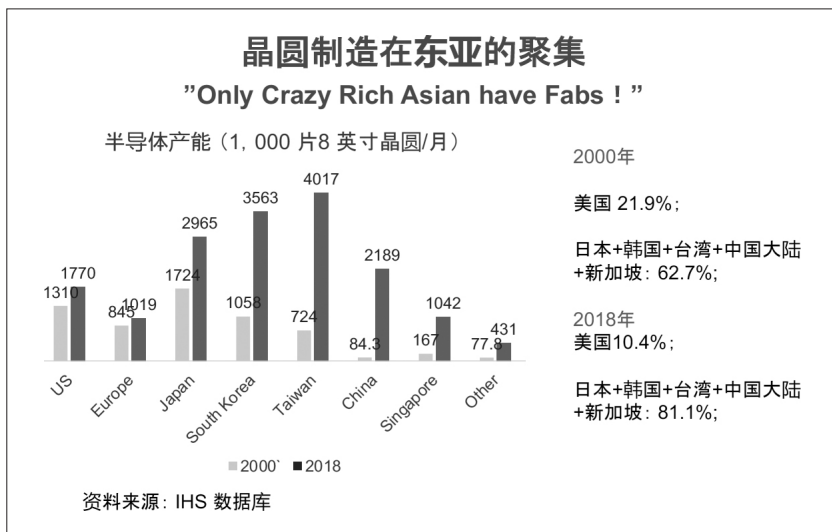


图 18：晶圆制造在东亚的聚集

在半导体产业中，美国在 EDA 软件设计获得了增加值的 72%，CPU、GPU 的增加值是 67%，制造是 42%。美国在知识密集型的半导体产业是有垄断地位的。美国不愿意做的是资本密集型，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

日本重振半导体产业的机遇

- 日本政府计划利用半导体产业链重构的机会，复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九州地区打造以熊本为中心的“半导体产业岛”。目前已经批准了2万亿日元的补贴。
- TSMC在熊本投资1.1万亿日元与SONY和Tenso建设一座可以制造28-12纳米的芯片厂，日本政府补贴4500亿日元；TSMC已经在讨论在熊本建设第二个工厂，制造普通芯片；
- 美光将在日本投资36亿美元扩大产能，日本政府补贴2000亿日元；
- IBM提供2纳米芯片设计，由日本Rapidus 制造，日本政府补贴3300亿日元；
- Intel 通过收购，将在日本获得两间半导体制造工厂。
- 三星将投资2.2亿美元在横滨建造一个研发中心。
(昔日三星是日本企业的宿敌)。



图 19：日本重振半导体产业的机遇

看一下日本的强项。全世界晶圆制造在 2018 年的分布是，美国一个月能生产 170 万片，中国能生产 219 万，台湾能生产 401 万，日本是将近 300 万。对于美国而言，新加坡太小，韩国不安全，台湾更危险，所以只有日本。美国是设计，然后由日本来制造，要进一步扩充日本。日本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重振半导体产业。目前已经批准了 2 万亿日元。日本在 2021 年的财政年度批准了支持半导体补贴，2022 年又支持了，所以目前加起来是 2 万亿。日本是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占 GDP 的 230%，

但是补贴起来毫不吝啬，无论多高，也拿出钱来砸半导体。

TSMC（台积电）在熊本投资了一个半导体工厂，2024 年就开始量产，主要生产 28 到 12 纳米的芯片。它的主要客户是谁呢？是索尼。索尼用在感光芯片上，特斯拉车的自动驾驶需要感光芯片，手机、照相机也需要感光芯片，索尼拥有全世界 50% 的份额。在我来之前，又报导 TSMC 在买地，准备在日本熊本建第二个工厂，这个工厂并不生产先进的芯片，就生产普通芯片。因为芯片需求未来最大的增长点是电动汽车，而电动汽车用的芯片都是普通芯片，不需要什么 5 纳米 10 纳米的技术。

美光是最近被制裁的公司，中国说美光产品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威胁，所以不能买。美光在日本计划投资 36 亿美元，它在广岛有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是在 2013 年收购的日本企业，现在这个工厂很赚钱，所以要扩建这个工厂。岸田宣布要把最先进的光刻机弄来，日本政府说好，给了 2 千亿日元补贴。IBM 已经设计出两纳米的芯片，日本不光让 TSMC 来做，还让美国人来。日本也新成立了 Rapidus 半导体公司，这个公司是由丰田和日本其他七大公司组织的，准备在北海道 2025 年开始量产，日本政府补贴 3300 亿。英特尔在收购一个以色列的公司，这个公司在日本有两个工厂，收购以后英特尔在日本也有工厂了。三星我刚才讲了，已经投资了一个研发中心。

所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是已经发生并且会继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增加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在核心

产业的韧性，并保障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在半导体、电动汽车领域。日本在推动这件事。这是高科技产业，不是生产鞋子、衣服，所以印度、印度尼西亚是帮不上忙的，美国不重视那些国家，谁生产裤子、生产鞋都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会跟中国全面脱钩，因为让中国生产鞋子、衣服很正常，生产家具也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定义的四大核心产业，他们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或产业链，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要重新打造一个生态系统。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我3月份在北京也讲了。我说第一件事就是要管控，我听外交部说到管控，我就用这个词。中美之间要进行积极谈判，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取消关税，这个关税是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一个特别大的因素。我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成立高级别的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不是开一次会就完了。这是一个固定的机构，美方有很高级别的官员，中方也有很高级别的官员。大家定期开会，收集中美两国企业所反应的问题，及时解决，不是要把所有的问题积到一起就开始打贸易战了。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也是贸易战不停地打，但是日本人积极和美国人进行谈判。我可以跟大家讲，日元升值是日本人提出的，而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我们的媒体经常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的阴谋，不是的，那是中国人的理论，没有一个日本人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的阴谋。谁先提出来让日元升值呢？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人先提出来，让日币升值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一开始说这个不行，我们

不能操纵汇率。后来，美国人接受了。因为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很快，所以日本说我们进行谈判，看你有什么要求，我们来满足，这样就解决了日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另外，我们在短期还要积极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提这个策略，是依据我的研究，为什么呢？从增加值的角度看，我们向发达国家每出口 100 美元，获得的增加值是 61 美元；而对发展中国家，我们获得的是 69 美元，获得的实惠更多。换句话说，即使发展中国家增长得不是那么快，但是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收入更多，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小米在印度，因为品牌归小米，软件也是小米的，把小米卖到印度肯定比把小米卖到美国，增加值更多，这个很好理解。

长期的策略，我认为中国第一是要打造更多的跨国公司，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美的贸易冲突导致了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最高峰的时候是 250 万辆，现在日本向美国的出口每年大概是 170 万辆，因为在美国生产了。我认为中国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个过程，实现自己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就需要有更多的跨国公司，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有个例子，苹果在越南有 21 个供应商，其中 7 个是中资公司。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不必要过度担心供应链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企业壮大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必须的过程。有一个例子，以零售价格算的话，中国做

iPhone 获得的增加值是 10%，但是如果看 OPPO，按照我在 2018 年做的研究，获得的增加值是 45%，小米是 47%。所以，出口自有品牌的手机，我们获得的增加值非常多。

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现在是一个产品/产能过剩的时代，需求比供给更为重要。在世纪经济格局变化的博弈中，需求比供给更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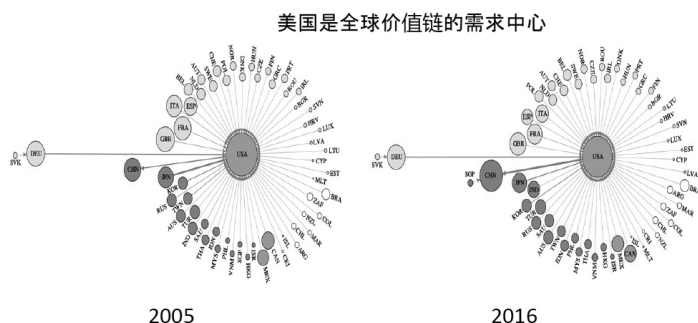


图 20：中国的长期策略

最后，我们要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变化，必须做到这个。说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那是从供给的角度。如果从需求的角度，你还可以画出一个图（图 20），你会发现美国是中心，2005 年是中心，2019 年还是中心，这个地位根本没有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供给大于需求的时代，由于技术进步，几乎任何产品都过剩，所有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卖给谁。所以拥有需求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博弈能力。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要调整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就得调整。很多人说，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那么高，为什么 TSMC 去呢？因为美国有税收补贴。另外，TSMC 的

客户都是美国公司。我们经常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我们是买终端产品，我们喜欢买 iPhone。但是对于 TSMC 来讲，他们的需求方是苹果、高通，是给这些美国的制造商做芯片的，因此就得听美国这些公司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是很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在里面。如果中国进去了，那么就是中国和日本在 CPTPP 里面，而美国不在里面，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积极，日本的想法是美国先进去，然后中国再进去。尽管我们的商务部部长表示想加入，但是日本的反应很不积极，其他国家也不积极。为什么政治上不正确？因为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石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单边开放，做出一个单边开放的姿态，没有必要跟你签这个、签那个，很麻烦。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中国的增长潜力也比美国高。我个人认为，在商言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放弃中国的。过去我们开放的目的是，你来这里投资，造完东西出口，这是我们过去的逻辑，一直这样下来的。我认为，现在实现单方面的开放，也许更会有效改变环境，这就是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可以对冲现在全球价值链脱中国化的不利趋势。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黄峰：谢谢邢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还有点时间。现在是我们的问答环节，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嘉宾：谢谢邢教授。我们在想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出海

有两个特别成功的例子，一个是拼多多，还有一个就是抖音。现在这两个企业，在不同的程度上都遇见了麻烦。这跟你刚才分析的制造性企业有不同的地方，从策略和建议的层面来讲，你对于这一类企业的出海有什么建议？

邢予青：坦率说，我真没什么建议，因为我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些企业。传统的出海，需要开公司、开厂。这个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就是不必在实体上出去，因为网络是全世界连通的，全球化的门槛变得非常低，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拼多多现在就是网上的沃尔玛。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拼多多应该在积累了资金以后，朝自己的品牌和设计走，不能永远做这种 10 块钱的生意。对于抖音，我大儿子在美国，他就说，中国到了海外以后要适应外国文化，要西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招人其实是很难的。

左学金：谢谢教授的很多信息。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中国科技产品出口，在 2017 年是 6000 多亿美元。我感觉这个数字，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的统计有关系，如果用增加值来统计的话，远远没有达到你讲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对于全球价值链重构你提了一些建议，包括中国要发展跨国企业，但是这里的前提是不是作为跨国企业要掌握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真正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为数还不多，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像华为曾经在 5G 的高端，但是被扼杀了。但是真正掌握高端的中国企业还是很少的。

邢予青：先回答的你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对。这也

就是为什么，我把那个作为一个出发点。我在早期就讲，我们需要有一套新的统计体系，我出了《中国出口之谜》这本书。安小远先生专门写了近 1 万字的书评，他就说，中国政府应该在这方积极推动贸易统计的改变。第一，这件事很重要；第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话语权，我们有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我的文章的思路是，现在的统计不适合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对于第二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对，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中必须有核心技术，苹果就是有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有品牌，实际上是设计和品牌。我个人一直认为，做技术、做品牌的重要，过去没有人认识到，现在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要这么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到目前为止，出口很多，但是没有品牌，对不对？为什么不做品牌呢？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不太愿意冒风险在品牌上投资，因为投资品牌有风险，你以为花一个亿就能打造一个品牌，也可能打造不出来。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能够冒这个险，我觉得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创新。这与文化也有关系，看一下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台湾也没什么品牌，但是韩国有品牌，可能是文化上不愿意冒风险决定的，我们更愿意做加工商，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说制药，其实药原料就是化工厂。印度人药做得好，不做原研药，就做仿制药，这是 2005 年以后的事。2005 年以前，印度可能是违反知识产权的，乱搞，2005 年以后印度是认认真真执行世界版权规定的。我经常说，如果

我们 5000 多个制造药的工厂能去做药片，而不是卖一吨一吨的药原料，我们大学生是不愁没工作的，我们现在内卷，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 8000 字的访谈，说的就是我们不是以创造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制。如果你们考察一下日本、美国、欧洲的所谓中产阶级，他们的工作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不对？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就业机制。

在国外，学经济学的人可以到大学，到华尔街，还有咨询公司，收入都是很高的。但中国哪有咨询公司？没有咨询公司。中国面临着贸易战、面临封锁，如果美国和日本企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的企业家就拿着钱去问，给我研究一下为什么以及怎么应对。我在中国做讲座，提问题的都是记者，然后是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企业家要面对非常具体的问题，一个具体的产品，一个具体的行业，学者不干这件事。咨询公司会做非常详细的调研和分析，然后才能给你一个策略，帮你决策。我们的企业家愿意不愿意出钱呢？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为知识是有价值的呢？我个人认为有许多观点要改变。

黄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

嘉宾：谢谢邢教授。刚才你分享中的最后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现在的观点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市场，是吧？这个观点的声浪越来越强。我们单边开放市场，如果弱化出口，不去赚外汇，而是纯粹的消费，是不是又会掏空我们？这个请邢老师再阐述一下。

邢予青：很多人认为，进口东西就是一种损失，我不知

道这里有没有做进口贸易的？比如说从日本进口杯子，到岸价是 10 元，零售价卖 50 元，那 40 元完全是在中国创造的价值。中国的网店也好，零售店也好，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进口是我们买别人的东西，不创造就业，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去海关调查一下，进口产品的到岸价和零售价差距特别大，这个差距就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它增加了我们的就业，也增加了收入。另外，中国开放以后，外国不是光把东西卖给你，因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讲，可以就在当地生产，更有利于在这个市场上扩张，比如特斯拉就在上海，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开放以后，他们会在中国投资，投资的钱进来了，然后会创造就业。

黄峰：谢谢，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邢教授的感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